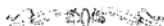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刊刻与 明清士人的“世界意识”



在明末较为系统地介绍的西学中,利玛窦所译绘的世界地图特别引人注目。人类文明的发展,一般与语言、图形、文字和数字符号出现的程序相伴随。文化的沟通一般也经历类似的阶段,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就是中西文化交流最初的图像符号,可以视为晚明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第一部汉文西学经典。作为汉文世界中世界面貌的第一次展示,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给中国人带来了许许多多新的知识点,该图的多次刊刻在中国乃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关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从1917年起,英国学者巴德雷(J. F. Baddeley)、希伍德(E. Heawood)、翟林奈(Lionel Giles)便开始了版本的探索,以后中国学者洪业、曹婉如等,国外学者鲇泽信太郎、德礼贤(Pasquale M. D. Elia)等都作过深入的研究。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在1936年先后发表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载《地球》第26卷第4号)、《月令广义所载之〈山海舆地全图〉及其系统》(载《地理学》第12卷第10号),澄清了《两仪玄览图》的刊刻者问题。1938年德礼贤以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藏本为主,加上世界各地的抄本,完成了意大利文版的《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梵蒂冈教廷图书馆1938年版)。该书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全部采入,并著录了中国、日本、伦敦、巴黎所藏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照片<sup>①</sup>;1961年作者还完成了《对利玛窦神父的汉文万国舆图的近期发现和最新研究(1938—1960)》(载《华裔学志》XX,1961年)。上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版本性质的考订。近人陈观胜从该图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方面进行过探讨;法国

<sup>①</sup> 参见方豪《梵蒂冈出版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读后记》,《方豪六十自订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页1898—1901。



学者德布东(Michel Destombes)在《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地图学》(载《尚蒂伊第3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1983年)一文中也评价了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地位。今人林金水、林东阳等则从该图对明末士人社会影响的角度进行过研究。近期最系统的研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黄时鉴、龚纓晏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一书。该书是迄今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绘制、刊刻、摹绘、流传和收藏的最为系统的研究。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讨论绘制和刊行,中编讨论源流与影响,下编为文献整理,包括利玛窦世界地图上的论说序跋题识全文、《坤輿万国全图》地名通检、研究文献目录,附录各种地图画像73幅,堪称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的百科全书。

由于古地图一般都手工绘制,成图再复制的数量极为有限,因此原本和复本的单幅地图,即使经过刊刻,其一般流通范围也很有限。然而,利玛窦世界地图属于中国地图史上一个比较罕见的例外,其作为单幅地图先后被诸多丛书、类书、文集收录和摹绘。正如中外前行研究所展示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在绘制、刊刻、摹绘和流传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其所涉及的大量关于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巨大的历史影响,并未完全阐释清楚。本章拟通过对《山海輿地图》、《坤輿万国全图》与《两仪玄览图》版本、图式、内容等三个重要的刊刻与传播系列的分析,来探讨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刊刻所引入的新知识点,以及对明清士人“世界意识”形成的影响。

## 一、利玛窦世界地图刊刻与传播的主要系列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出生在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城,利齐家族是该城的望族。Ricci意为“海刺猬”,这个家族也正是以海刺猬为族徽的。其父乔万尼·利齐从医,曾在教皇国担任行政长官。利玛窦有七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是长子。其母乔万娜·安乔莱利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幼年期间,利玛窦便开始学习西方哲学家有关伦理和科学的书籍,启蒙老师白启完神父是一位耶稣会士。9岁时,耶稣会在马切拉塔城开办了学校,利玛窦是最早入学的学生之一。裴化行著《利玛窦评传》称“他在人文科学和文学课程方面成绩优异”。16岁中学毕业后,父亲希望儿子日后从政,所以把他送到罗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在罗马,利玛窦认识了耶稣会总会的神父们,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了该会在罗马城的组织——圣母会,时间大约在1569年。此后,他与耶稣会士的接触更加频繁。1571年8月15日,利玛窦前往耶稣会总会驻地,正式提出入会申请,得到批准。1572年9月,他



进入了耶稣会创办的罗马学院<sup>①</sup>。该学院中有哲学教师罗曼诺、经学神学教师帕拉和帕埃兹、实证神学教师费南德斯等。其中最有名望并对利玛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克拉维斯(Christoph Clavius, 1537—1612, Clavi-, 在拉丁文中有“钉状”的含义, 中国古字“丁”通“钉”, 所以克拉维斯的名字在汉文文献中多称为“丁先生”)和贝拉明(Robert Cardinal Bellarmine)。克拉维斯是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朋友, 是伽利略科学研究的积极支持者, 同时也是《儒略历》的主要修订者。贝拉明是善于辞令的辩论家, 他的“辩论课程”给利玛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up>②</sup>。

在罗马学院求学期间, 利玛窦受到了西方古典科学文化的熏陶, 学习了数学、天文、地理、绘图等课程, 在从学丁先生的四年中, 已经精通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学、行星理论和基督教教历在内的计算理论, 运用仪器观察行星和地理测绘的使用技术, 以及制作罗盘、钟表等技巧。利玛窦不仅受到了西方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熏陶, 同时, 圣方济各·沙勿略在远东传教的故事也像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英雄业绩那样, 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年轻人。虽然沙勿略最终未能踏上中国本土, 实现传教的愿望。但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所指出的耶稣会士中国化的方向, 却为利玛窦后来的成功开启了道路, 也激励着他百折不挠地去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 以完成方济各·沙勿略未竟的事业。来亚洲前他还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哥因布拉大学学习葡萄牙语和浏览这所著名大学的藏书, 并购买了一册 1570 年出版的奥代理的《地球大观》(Abraham Orteliu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以供航海参考<sup>③</sup>。1578 年 3 月 24 日他与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 字复初, 1543—1607)等 14 人乘“圣路易号”船东渡。9 月到达果阿, 他奉命留在那里继续学完在罗马尚未修完的神学。1579 年他在果阿修道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 此后又在交趾支那教书和工作。1582 年 4 月, 奉范礼安选调, 利玛窦于 8 月 7 日抵达澳门<sup>④</sup>。同年他们就开始实施进入中国内地并定居肇庆的计划。肇庆地势整齐, 风景清幽, 是中国南部最清秀、最洁净的一个城市<sup>⑤</sup>。当时是两广军事的重镇, 1564 年至 1649 年间曾是两广总督府所在地, 是广东西江走廊经

① [法] 裴化行著, 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 商务印书馆, 1993 年, 页 14。

②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页 5—6。

③ 参见罗光《利玛窦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贡献》, 《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湾辅仁大学, 1983 年。

④ 《利玛窦年谱》, 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页 11。

⑤ [法] 裴化行著, 萧清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页 240。



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sup>①</sup>。前后经过约一年的努力，定居肇庆的计划得以实现。利玛窦等定居肇庆的主要支持者是当时新上任的肇庆知府王泮。

王泮在中国的文献史料中记载不多。《肇庆府志》光绪二年重刻本引万历《志》称：“王泮，字宗鲁，山阴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八年知肇庆府，十二年迁按察使副使，分巡岭西，驻肇庆。慈爱和易，士民见者，语次寻绎，甚有恩惠，未尝疾言遽色加人，而确然有执，虽门生故交无私也。好为民兴利……泮性恬淡，自奉如寒士。居官廉洁，焚香静坐，若禅室然。诗辞冲雅，书法遒丽，有王右丞之风，粤中文士皆来就正。十六年迁湖广参政，高要、高明士民，遮留泣下，各建祠祀之。”<sup>②</sup>但由于《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德礼贤的著作，使他在西方文献中却变得赫赫有名。王泮是利玛窦第一个晋见的中国地方高级官员。《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了利玛窦 1583 年 9 月初离开澳门神学院，在总督府派来的士兵的护送下，于 9 月 10 日到达肇庆。王泮在知府官邸接见了他们。王泮“坐在他的官位上；当他们(利玛窦等)按习惯向他下跪时，他询问他们是谁，来自何方，来此何事”。听了利玛窦等人“极其谦卑”的回答和恳求后，他表示接受他们在肇庆定居的请求。利玛窦写道：王泮“看来是个天性乐善好施的人，带着有点殷勤的态度。他一开始就对神父表现友好，情况许可时还支持他们。在最后一次晤谈中，他的答复大致如下：他完全不怀疑他们的诚实，并且愿意把他们置于他的保护之下”<sup>③</sup>。

不久，利玛窦得到了王泮的通知，称两广总督已经同意他们的请求，并在肇庆西北岸尚未建造好的崇禧塔附近拨出一块土地，作为他们的居室。按照《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述，利玛窦原计划建造一幢两层楼的欧式建筑，但考虑到当时肇庆有许多反对利玛窦等人定居的势力，为了慎重起见，“怕天性多疑的人会以为他们是在修碉堡”，放弃了原来两层的设计方案，接受了“总督批准指定的一所住宅”。可能后来利玛窦将这所住宅进行了部分的改建和扩建，裴化行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一书下编以“仙花寺”

① 参见刘伟铿著《岭南与西江史论稿》，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8年。

② 同一记述也见于过廷训《分省人物考》(天启刊本)等文献，参见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第5卷(1936年)第3、4合刊。《广东通志》卷245《宦绩录十五》称王泮为“嘉靖进士”，“万历八年知肇庆府。十二年擢按察司副使分巡岭西，亦治肇庆，慈爱和易，士民见之未尝疾言遽色，而确然有执，虽门生故交无私也。好为民兴利，导后沥水入江，筑跃龙桥，建崇禧塔。大治肇庆阳江学宫，又为阳春学置田”。他以“居官廉洁”得到了肇庆人民的高度评价，万历十六年他迁湖广参政时，“高要士民遮道泣下，建祠事之”。

③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160—161。



为题，专门讨论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肇庆的活动，指出“这所房屋是用青砖和白灰筑成的，并称不上是一座带有西洋美术意味的典型建筑，但是，这是一所实用而又足以应付需要的建筑；它下层一共有五间，中间是暂时用作圣堂的一间客厅，每旁各有两间；上层是司铎们的主屋”<sup>①</sup>。王泮经常带着一些高级官员去他们的寓所访问他们，对他们带来的西洋物品，如三棱镜、圣母像、乐器、钟表等表示出浓厚的兴趣<sup>②</sup>，甚至还特别喜爱罗明坚用中文编写的《天主圣教实录》，“印了许多册，在国内广为流传”。他“发现欧洲教士在学术和文化方面比他想象的要更为先进”，为了表示他对于利玛窦等人传教活动的支持，他用极为隆重的方式，将他为利玛窦所居之处所写的“仙花寺”和“西来净土”这两块匾送到了利玛窦等人的寓所，前者挂在整个建筑的大门上，后者放在接待宾客的会客厅<sup>③</sup>。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就精辟地指出：“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晚明利玛窦之‘坤輿图说’、艾儒略之《职方外纪》。”<sup>④</sup>利玛窦之“坤輿图说”，其实即指其世界地图的解说。利玛窦是欧洲刊刻的世界地图在中国的第一个代言人，同时，以他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华的学术形象首先也是靠译绘世界地图建立起来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最早的版本，也是所有版本的母本《山海輿地图》是在肇庆刊刻的，而王泮又在这份中文世界地图刊刻中则扮演着产婆的角色。在我们现在所知利玛窦 12 种世界地图的原刻、翻刻和摹本中，就其传播与影响来说，笔者认为当首推《山海輿地图》、《坤輿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三个系列的刊本。下面就以三个刊本系列的形成和流通为线索，进行简要的分析。

### 1. 《山海輿地图》的初版和修订版

西方耶稣会士非常懂得印刷术和图书对于向文明民族传教的重要性，罗明坚和利玛窦在他们的寓所“仙花寺”办起了一个藏书室，把已经获得的几箱子书，尤其是大厚本的教典法予以陈列，有一间房甚至摆满了四壁。除书籍外，还有圣母和救世主的油画和图片<sup>⑤</sup>。在寓所接待室的墙上还挂有

① [法] 裴化行著，萧潜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 年，页 248。

② 由于利玛窦是很多西方器物的最早传送者，因此民间有将其偶像化的倾向，如马相伯在《乐善堂记闻》中曾记述：“沪苏曩时钟表店，常悬一个黑袍人像；有人讲是利玛窦，因他来中国传教，曾将自鸣钟进贡，算是开创中国钟表业的始祖，所以敬他。”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页 1040。

③ [意]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年，页 172—173。

④ 朱维铮编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页 467。

⑤ [法] 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1993 年，页 99—101。



西文世界地图(mappamondo universale),据冯锦荣之见,该图可能是Martin Waldseemüller(1470—1521?)绘制的《世界地图》(*Cosmographia Mundi*, produced in St. Dié, Lorraine; published in Strabourg, April 25, 1507)<sup>①</sup>;或说此图原作在1546年由喀斯塔尔迪在罗马刊行,在威尼斯由弗尔拉尼·贝特利和卡莫西奥等人仿造,在安特卫普又由原籍德国的比利时著名地图学家奥代理(A. Ortelius, 1527—1598,又译奥尔特利尤斯)仿造。利玛窦这份西文世界地图就是奥代理在1570年刊印的地图<sup>②</sup>。有的学者认为利玛窦是参照《地球大观》绘制的。《地球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是一部大型地图集,第一版共计53幅图版,包括一幅与地图集同名的世界地图,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地图,以及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分图。问世后广受欢迎,从1570年至1612年用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荷兰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共推出了40多版,至1598年奥代理去世时,该书的图版及附图已经增加为150多幅<sup>③</sup>。当时许多来利玛窦住宿参观西洋镜和钟表等外国东西的人,一眼看见了这些世界地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羨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图。”很多中国士大夫认为这幅西文世界地图所显示的中国仅仅只有大东方的一部分,这与他们以往对天下的认识截然不同,他们要求对这幅图进行研究。王泮与利玛窦商量,“表示要请他在译员的帮助下,把他的地图写为中文,并向他保证这件工作会使他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大家的赞许”<sup>④</sup>。在王泮直接要求下,利玛窦与译员一起把这幅图译成了中文,1584年,由王泮出资刊刻的第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图正式诞生,这就是著名的《山海輿地图》。成图的过程,据裴化行称是这样的:利玛窦“一面参考他的

① 冯锦荣《明末西方日晷的制作及其相关典籍在中国的流传》,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339。

② 参见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页203。

③ 在利玛窦的通信和回忆录中多次提及《地球大观》,1595年在南昌还将该图册送给建安王,1601年作为贡品呈送万历皇帝,直到1608年他还收到从欧洲寄来的新版。参见罗光《利玛窦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贡献》,《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辅仁大学,1983年。黄时鉴、龚纛晏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5、30、65、69;冯锦荣称1608年8月22日,利玛窦在北京致书阿桂委瓦神甫的书简中谈及曾收到奥尔德耳(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即奥代理)的世界地图(*Theatrum Orbis Terrarum*, Coppenium Diesth, Antverpiae, 1570, 1595),北京天主教北堂图书馆藏书编号2355、2356;参见冯锦荣《明末西方日晷的制作及其相关典籍在中国的流传》,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345。

④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179—180。



旅行日记及别的西洋书籍，一面借翻译官的帮助，编成一本注解地图的小册子，并在内插入天主教仪式及各地方习俗的记录。利玛窦并把地图的尺寸放大。在演讲中，利氏立即命人刻好底版，当众将地图印出，分散给予来宾”<sup>①</sup>。

《山海輿地图》的原刻目前尚未发现，因此关于这幅图的最早面貌至今成了一个谜。上述材料似乎表明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中国仍是在世界地图的东面。然张维华指出：“利玛窦于其所绘之地图中，指明欧亚方位，一在极东，一在极西，相距遥远，无侵扰之意。……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其目的既以宣教为重，故于地图之制作，亦以迎合华人之心理为要。华人素信中国居世界之中，且惟中国为大，此外均小邦，不足与中华比。及见西人所制世界地图，中国局于一隅，辄为不悦。利玛窦以后便稍更地图绘法，置中国于世界地图之中。”<sup>②</sup>据此，或以为《山海輿地图》应有两个版本，第一版将中国的位置绘在地图“极东”，第二版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央<sup>③</sup>。然而，张维华的意见我们至今不能找到原始文献的支持<sup>④</sup>。《利玛窦中国札记》说得很清楚，原图是用“欧洲文字标注”的，“新图的比例比原图大，从而留有更多的地方去写比我们自己的文字更大的中国字。还加上了新的注释，那更符合中国人的天才，也更适合于作者的意图，当描叙各国不同的宗教仪式时，他趁机加进有关中国人迄今尚不知道的基督教的神迹的叙述。他希望在短时期内用这种方法把基督教的名声传遍整个中国。……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因此，利玛窦改变了他原来的设计，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图中不仅有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从中还能读到五大洲不同地区和民族的风俗<sup>⑤</sup>。可见，《山海輿地图》中应该是有相当多的文字注释。利玛窦《地球图说》中称：“此图本宜作圆球，以其入册籍，不得不析圆为平。”洪业指出“入册籍”一句表明《山海輿地图》

① [法]裴化行著，萧清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278。

②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页199。

③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郝晓光等持这一看法，并试图进行《山海輿地图》的复原研究。

④ 明末熊明遇与熊人霖父子的《函宇通》中保留的两幅中文世界地图，《格致草》中的《坤輿万国全图》与《地纬》中的《輿地全图》，都是据16世纪欧洲地图的翻译的，零度经线在地图中央，中国确实是放在地图的最右边。但黄时鉴等已经考证，认为它们与利玛窦世界地图并无关联。参见黄时鉴、龚纓晏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50—56。

⑤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179—181。



是一幅小小的地图，原本是插在一本书中的<sup>①</sup>。

《山海輿地图》这份篇幅不大的地图是由王洋出资刻印的，“他自己出钱多制了几幅地图，分赠给他在当地的友人，并命令把其余的图送到各省去”<sup>②</sup>。由于早期能见到的中文世界地图非常粗糙，有的学者怀疑《山海輿地图》的质量，1584年11月30日利玛窦在给罗马耶稣会总监的信中已随附“西式绘制，用华名、华里、华辰计算的世界地图一幅。这图是肇庆长官授命玛窦编制，刚完成，便拿去刊印了。图中的很多讹误，一半是刻工不慎，一半是由于玛窦当初不知道会立即付印，因此编制疏忽。在欧洲，实在是不足称道的”<sup>③</sup>。由此可见，怀疑此图制作粗糙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但经王洋付刻多份转送友人，使中国士人通过这一地图第一次见到了世界面貌。《利玛窦中国札记》写道：“地图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以至利玛窦开始用铜和铁制作天球仪和地球仪，用以表明天文并指出地球的形状。他还家里绘制日晷或者日晷刻在铜版上，把他们送给各个友好官员，包括总督在内。”<sup>④</sup>从利玛窦的通信中可知，他在南昌期间编绘过多种世界地图，因此，或有学者以1585年南昌白鹿洞书院院长章潢（1527—1608）撰《图书编》卷二十九收录的只有53字的《輿地山海全图》，来判断王洋版的《山海輿地图》的内容。《图书编》卷二十九有章潢的《地球图说》，该篇称：

地与海本圆形，而同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直道，自直道而南九十度为北道，日行直道则昼夜平行，南道则昼短，行北道则昼长……夫地厚二万二千九百零八里，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是浑沦一球，原无上下。总六合内，凡足所伫即为下，凡首所向即上矣，此无疑之论。其专以身之所居分上下，未然也。且予自大西洋海入中国，转南过大浪山，已见南极高三十六度，则大浪山与中国岂不相为对待乎？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兹以普天下輿地分五

① 参见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第5卷（1936年）第3、4合刊。

②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182。

③ 文陀利编《利玛窦全集》（Pietro Tacchi Venturi, *Opera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第2卷，玛塞莱塔，1913年，页51；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12—413。

④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182—183。





州，曰上下亚墨利加，曰墨瓦蜡泥加，曰亚细亚者，曰利未亚，曰泥逻河，其各州之国繁颗(夥)难悉，大约皆百以上。此图本宜作圆球，以其入册籍不得不析(折)圆为平。其经纬线画每十度为一方，以分置各国于其所。东西线数自中国起，南北线数自福岛起也。此图即太西所画，彼谓皆其所亲历者，且谓地象圆球是或一道也。<sup>①</sup>

据文中的“予自大西浮海入中国”可知此文非章潢所撰，而是“太西”——利玛窦的作品。不难见出，该文很多内容与《坤輿万国全图》的总论部分几一脉相承，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区别是“五洲”的名称中没有“欧逻巴”，却另将“泥逻河”列为一洲，而《輿地山海全图》的欧洲部分未有的文字标注，却出现在章潢所绘制的《輿地图》上。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况，原因不明。或许章潢当时对于西方地图的认识有限，在地图判读上有误，将“欧逻巴”的译名与“泥逻河”混淆了<sup>②</sup>。《图书编》卷十六和卷二十九有东西两半球图、《輿地山海全图》和南北两半球图，据此或有推测《山海輿地图》既有整幅的地球图，又有南北两半球图等<sup>③</sup>，这些看法，笔者以为颇有见地。

万历二十六年(1598)，利玛窦离开南昌去北京，路过南京时，见到有《山海輿地图》的苏州石刻拓本，这是应天巡抚赵可怀从镇江知府王应麟处所得，心生奇慕，于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间(1595—1598)令人摹绘刻石的，赵可怀还写有一跋，对之“赞扬备至”，并将刻本送给南京的王忠铭尚书。赵可怀从王忠铭处得知利玛窦路过南京时，立即差遣随员抬着车轿往谒，“无论如何也得把这样的一位异邦俊杰接来”<sup>④</sup>。万历二十八年(1600)，利玛窦在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的要求下增订王洋版。据有的学者推测，其大小为长180厘米、宽80厘米左右<sup>⑤</sup>，图中“增加一些更详尽的注释”。吴中明称他准备将这幅世界地图挂在自己的官邸，让公众观赏。利玛窦当然高兴，

① 章潢《图书编》卷二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页553—555。

② 德礼贤曾利用奥代理《地球大观》的1570年版作过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意大利文—汉文对照表，“利未亚”标注意大利文“Libia”，“泥逻河”可能是拉丁文“Nigeria”的音译，表示尼罗河以及周边国家，也许章潢误听传教士口头言说有“五洲”，但又在地图上遗漏标注，于是将“泥逻河”列为五洲之一。

③ 曹婉如等《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但林东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辅仁大学，1983年)认为章潢摹刻本的时间在1613年。

④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1993年，页243—244。

⑤ [法]米歇尔·德东布《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的地图学》，[法]安田朴、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年，页232。



因为这是一个向中国人传播“世界意识”的好机会。“他大规模地重新绘制了他的舆图，轮廓鲜明，便于检查。他加以增订并改正了错误，毫不迟疑地修订了整个作品”。吴中明对这个增订版非常满意，雇了专门的刻工，用公费镌石复制，并撰序予以高度赞扬，认为该图是利玛窦等西人“好远游”的产物，其数据应该是可信的<sup>①</sup>。这幅题为《山海輿地全图》的初版修订版“在精工细作上和印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原来广东的那个制品。它的样本从南京发行到中国其他各地，到澳门甚至到日本”。其中有一份在1604年传到时任贵州巡抚郭子章<sup>②</sup>的手中。郭子章认为此图过大，不便观览，于是在贵州进行了缩刻，对图中许多国家都增加了适当的注释，题为《古今郡国名类》，并撰序大加赞扬，称利玛窦关于地球上下四旁皆有生齿所居，“浑然一球，原无上下。此则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者”<sup>③</sup>。

《山海輿地全图》虽然至今仍未找到原版，所见的冯应京《月令广义》、王圻《三才图会》中所谓摹刻本均为后人的推定与假说，但作为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祖本，其在研究中文版世界地图的传播史上，有着重要的讨论意义。

## 2. 《坤輿万国全图》绘本和李之藻的刊本

利玛窦手绘的《坤輿万国全图》是彩色的。南京博物院就藏有该图的设色摹绘本。原是六幅屏条，拼接连合成一图，而今装裱为一整幅，纵168.7厘米，通幅横380.2厘米<sup>④</sup>。在利玛窦撰的全图说明中曾指出：“其各州（洲）之界，当以五色别之，令其便览。”南京博物院所藏摹绘本的地图色彩整饰并没用五色来区别五大洲，大体只用了三色：南北美洲和南极洲呈淡淡的粉红色，亚洲呈淡淡的土黄色，欧洲、非洲则近乎白色，少数几个岛屿的边缘晕以朱红色。山脉用蓝绿色勾勒，海洋用深绿色绘出水波纹。利玛窦在说明中称：“天下五总大洲用朱字，万国大小不齐，略以字之大小别之，其南北极二线昼夜长短平二线，关天下分带之界，亦用朱字。”各大洋绘有不同类型的帆船、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15头，南极大陆绘有犀牛、象、狮子、鸵鸟

① 《山海輿地全图·吴中明序》，《月令广义·图说》，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陈邦泰刻本。

② 郭子章，号青螺，江西泰和人。隆庆进士，官潮州太守、四川学政、贵州巡抚。因平定杨应龙反叛幼功，升兵部尚书。著有诗文集《粤草》、《蜀草》、《黔草》、《潮中杂记》等15种著述。参见陈其泰《郭子章〈潮中杂记〉的文献价值》，《学术研究》2009年第2期。

③ 参见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355；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第5卷（1936年）第3、4合刊；罗光《利玛窦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贡献》，《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辅仁大学，1983年。

④ 曹婉如等《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



等陆上动物 8 头,这些并不产于南极洲,绘在那里主要还是为了点缀图中空白。洪业认为这个彩色摹绘本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诸太监的摹绘本,其中的船只、奇鱼、异兽是“从他处摹抄来的”<sup>①</sup>。曹婉如等文章认为太监是不敢擅自加上去的,太监在宫中也弄不到这些图画,因此利玛窦的原图上应该是有动物的<sup>②</sup>。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有的版式是与 1602 年李之藻刊本完全一致的绘本,其中亚洲用黄色、欧洲深红、非洲深蓝、美洲紫色、南极洲灰色;赤道、子午线涂成黄色,南北极圈、回归线及部分铭文涂成红色<sup>③</sup>。这倒与利玛窦所说的该图“其各州(洲)之界,当以五色别之”完全吻合,也许维也纳藏本才是利玛窦的原本。

《坤輿万国全图》刊本是万历三十年(1602)由李之藻付梓的。李之藻(1571—1630),字我存,又字振之,教名“良”(Leo),号凉庵居士,又称凉庵逸民、凉叟,浙江仁和人(今杭州西湖区),万历二十二年(1594)23 岁乡试中举,1598 年 27 岁会试中进士,授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有“江南才子”之誉,也是一个有地理癖的才士,曾经绘制过中国十五省的图志<sup>④</sup>。在北京拜访利玛窦时,看到了《山海輿地图》的改绘本,大开眼界,深为所动,决定重刻。

与利玛窦在地图刊刻上的合作,使李之藻对利玛窦深感佩服,1604 年李之藻遭贬黜,他将《坤輿万国全图》的雕版带回杭州。1605 年 5 月,他在山东章丘为小官,利玛窦给他送去了横式和竖式的两具日時計。两人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607 年李之藻路过杭州,将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关于测象仪的著作付梓,1608 年 3 月以前又刻印了克拉维斯评论萨克罗博斯科天球仪的文章<sup>⑤</sup>。1610 年李之藻在北京突患重病,生命垂危。当时他只身在京,旁无眷属,幸得利玛窦“朝夕于床第间,躬为调护”。李之藻康复后,认为是利玛窦的上帝拯救了他,于是听从了利玛窦的劝告,受洗加入了天主教。万历三十九年(1611)因其父病逝,李之藻告假返杭,临行时邀请郭居静等到杭州开教,直接促成了杭州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展开<sup>⑥</sup>。

① 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第 5 卷(1936 年)第 3、4 合刊。

② 曹婉如等《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③ 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6 年,页 1。

④ 关于李之藻的生年,参见龚缨晏等《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 5 月第 3 期。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 年,页 113—114;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 年。

⑤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1993 年,页 564—565。

⑥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 年,页 116—117。



《坤輿万国全图》刊本现藏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和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另有原藏巴黎圣·雅克大街克莱芒学院耶稣会图书馆的1602年的刊本几经拍卖,1991年又见于索斯比拍卖行。据洪业记载:伦敦、梵蒂冈和京都大学本同出于一版,原图的大小为长164厘米、宽为62.5厘米,分为六幅,可展可合,六幅相合,成一椭圆世界地图。笔者所据的《坤輿万国全图》是1936年禹贡学会影印本,其中并无任何动物人物。该图由椭圆形主图、四角圆形小图与中文附注文字组成。主图为世界全图,显示了五大洲的相对位置,中国居于图的中心;山脉用立体形象,海洋刻画出密密的波纹;南极洲画得很大。在该图的空隙处填写了与地名有关的附注性说明,其中两篇为利玛窦署名,介绍地球知识与西洋绘图法。主图采用的是等积投影,经线为对称的弧线,纬线为平行直线。右上角有九重天图,右下角有天地仪图,左上角有赤道北地半球之图和日、月食图,左下角有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和中气图,另有量天尺图附于主图内左下方。全图的文字,大约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地名,约有850个以上的地名;二是题识,有利玛窦、李之藻、吴中明、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共六篇;三是说明,包括全图、九重天、四行论、昼夜长短、天地仪、量天尺、日月蚀、中气、南北二半球等的说明;四是表,有总论横度里分表、太阳出入赤道纬度表;五是附注,对各洲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进行解说。

据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一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从1584年起在明末先后刻有不同的版本多达12种。其中以1602年李之藻刻板的《坤輿万国全图》流行最广。据该图利玛窦序所述制图之历史,该世界地图“显具十六世纪比利时地图学派之影响”。可能参考过荷兰地理学家麦卡托(C. Macator, 1512—1594)1569年的地图、奥代理(A. Ortelius, 1527—1598)1570年的地图和荷兰制图学家普兰息阿斯(Petrus Plancius, 1552—1622)1592年的地图,该图中细致的海水波纹,是意大利地图家的画法<sup>①</sup>。尽管我们无法对《山海輿地图》与《坤輿万国全图》进行比较,但从各种文献的记述来看,后者较前者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北京绘制《坤輿万国全图》时,利玛窦已经有了1587年增订版的《地球大观》,他将其中一些重要的修订采用到了《坤輿

<sup>①</sup> 参见〔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利玛窦的记忆之宫》(*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纽约 Viking Penguin Inc. 1984年英文版,页148—149;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第5卷(1936年)第3、4合刊。



万国全图》上，如吸收了奥代理关于南美西海岸线的新的画法。同时他还采用了普兰息阿斯世界地图中的内容，如《总论横度里分》表等，《坤舆万国全图》的《论地球比九重天远且大几何》的主要内容和该图的《九重天图》、《天地仪图》、《天地浑仪说》等，是来自其老师丁先生 1570 年出版的名为《沙氏天体论评释》（*In Sphaeram Joannis de Sacrobosco Commentarius*）。来自丁先生的还有其《晷表图说》（*Gnomonique*），还有部分内容来自皮高劳密尼 1540 年出版的《天球论》（*De la Sfera del Mondo*），如“四行论”、九重天的距离及其运行周期、五带划分、日食与月食理论，写在南极大陆上的“看北极法”等<sup>①</sup>。

在《坤舆万国全图》绘制过程中，利玛窦还广泛参考了多种历史典籍，还包括他本人的旅行实测和中国商人和旅行家海外归来的口述资料，关于中国的部分，比较充分地利用了中国的文献资料，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大明一统志》的附图、罗洪先的《广舆图》、徐善继等的《地理人子须知》等，对世界地图中的许多译名都作了本土化的处理，这些显然包含有李之藻的工作。如该图中出现的“一目国”、“矮人国”、“女人国”、“狗国”，都不见于欧洲原图，显然是借自《山海经》；牛蹄突厥中的“人身牛足”、北室韦的“衣鱼皮”、鬼国的“身剥鹿披为衣”等，都来自《文献通考》；该图中关于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注文，如暹罗的“婆罗刹”、三佛齐的“古干陀利”等许多内容则来自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sup>②</sup>。这以传统的内容和名称转述欧洲的新知识，以便于中国读者接受的方式，成为后来西方传教士

① 沙氏（Joannes de Sacrobosco）为 13 世纪前期的英国人，英文原名为 John Holywood，长期任教于法国，《天体论》是其主要著作。参见黄时鉴、龚缨晏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页 71—72、84。

② 参见赵永复《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所用的中国资料》，《历史地理》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年。利玛窦可能还利用了当时海外归来的中国商人或旅行家的口述资料，如《坤舆万国全图》关于“巴西”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记述：“伯西儿，此古‘苏木’。此国人不作房屋，开地为穴以居，好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以鸟毛织衣。”近旁还有一段：“南亚墨利加今分为五邦……，伯西儿，即中国所谓‘苏木’也。其至南又有巴温地方，其人长八尺，故谓之长人国，皆无文字，结绳为治。”其中“伯西儿，即中国所谓‘苏木’也”一句最让人费解，“苏木”一词在传统文献释为植物而不作为地名，以此句似乎国人已有称“伯西儿”为“苏木”者。笔者认为，16 世纪初起葡萄牙东渡印度洋，1510 年占领果阿，1511 年占据马六甲，1519 年攻占墨西哥，1557 年窃据澳门，建立了地跨亚洲、非洲、美洲，连接澳门—果阿—里斯本—巴西的“香料贸易”的渠道。西班牙则于 1521 年进入菲律宾，1565 年建立殖民地，在太平洋上开辟了塞维尔（西班牙）—阿卡普尔科（墨西哥）—马尼拉（菲律宾）—闽粤口岸的第二条渠道。有确切记载表明：明万历十三年（1585）有三个中国商人到过墨西哥，16 世纪初在巴西的葡萄牙贵族的家庭中已有人使用中国瓷器了，到 17 世纪初巴西上层社会家庭已广泛使用昂贵的中国瓷器，用于装饰房间和充当赌注，甚至用来偿付殖民官员，抵挡部分现金使用。（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 832—851）可以想象来往这两条渠道的中国人多少会在归国后给家人或朋友讲述自己的海外经历和域外传奇，“中国所谓苏木也”一句，可能是利玛窦采摭的同时代海外归来中国人所口译述的巴西地名。此条恰恰成为利玛窦绘制地图时注意时人口述资料的一个证据。



制图中普遍采取的一种文化手段。

李之藻将刊刻的《坤輿万国全图》分赠给亲友,受到热烈欢迎,不少人闻讯前来索取,还有人送纸求印,一时间供不应求,只能再次印刷。制阕此图的刻工也偷偷地私梓一版。所以此图的印数总计达千份以上<sup>①</sup>,不仅流传中国各地,还远传域外。万历癸卯年(1603),朝鲜赴京回还使臣李光庭从北京携回欧罗巴国舆地图一件六幅<sup>②</sup>,有人认为即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17世纪初大阪的德川家康的外交顾问威廉·亚当斯(即三浦按针)向家康提供了海外形势和世界地理的情报,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1606年传到了日本,1645年被日本翻刻。整个江户时代制作的世界地图和世界地理书无不直接间接受其影响。尽管1630年起幕府曾实行过禁书制度,但《坤輿万国全图》等仍漏网流入日本。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一批杰出的兰学家都接触过《坤輿万国全图》等地理学汉文西书,如完成于1713年的新井白石(1657—1725)所著最早有系统的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用国际军事观点记述欧洲、非洲、亚洲、美洲各国的地理,其中大多数资料是根据《坤輿万国全图》和荷兰制的世界地图。1786年日本第一流地理学者桂川甫周(1751—1809)编译的《万国图说》,原本是据约翰·布拉乌1639年出版的世界地图。地名、译文大部分沿用《坤輿万国全图》的图说和《职方外纪》,内容是记述五大洲的国家、岛屿、河流、海湾、山峰等,兼及各地土特产。1715年,新井白石在《西洋纪闻》中以“形而上”和“形而下”区分了“西洋”和“东洋”,欧罗巴作为“西洋”,中华作为“东洋”,表明日本已经开始在东西对峙的文明世界图像中,确立自身的位置<sup>③</sup>。《坤輿万国全图》是目前流传最广的版本,后人讨论利玛窦世界地图大多据此版本系统。

### 3. 李应试与《两仪玄览图》

有的学者指出,利玛窦在华绘制的世界地图中还有一幅朝鲜人李应试协助绘制的《两仪玄览图》<sup>④</sup>。据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研究,《两仪玄览图》

① 参见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方出版社,1993年,页79。

② 李晔光《芝峰类说》卷二。

③ [日] 鲇泽信太郎《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日本文化史上之地位》,东京龙文书局,1944年;法国学者德伯格在《利玛窦1602年的地图及大阪藏其朝鲜版本》(《亚细亚学报》1986年)一文中称,《坤輿万国全图》在朝鲜和日本都有仔细的刻板和本。参见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46、79、159—16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446。

④ 参见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页205。



1603年由李应试刊刻于北京,这幅地图共八幅,每屏幅纵200厘米、宽55厘米、通宽约442厘米,1949年在沈阳故宫翔凤阁发现。该图以《坤輿万国全图》为蓝本,由原来的六屏增加到八屏,除吴中明的旧序文外,还有李应试序跋各一,利玛窦序两篇,以及冯应京、常胤绪、阮泰元、钟伯相、侯拱宸的序<sup>①</sup>。图上的另一条识语称参与刊刻的还有“耶稣会友人”钟伯相、黄芳济、游文辉、倪一诚、丘良稟、徐必登等人。同样的《两仪玄览图》也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该图的汉字旁边加注有墨书满文,而且山脉大都用青绿彩绘,十分醒目,当是清初流传入清宫内府供清帝浏览之用的<sup>②</sup>。冯应京在此图序中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凡三授梓。递增国土,而兹刻最后乃最详”。阮泰元的跋也称该图“幅愈广,述愈备”。可见该图是利玛窦绘制的所有世界地图中规模最大的一件<sup>③</sup>。

所谓“两仪”,是“天地”之意,而“玄览”源于道家的“玄象”。该图李应试序中有“往哲以鸡卵喻两仪……余嗜中土玄象”。《老子》对“玄览”的解释是“心居玄冥之初,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两仪玄览图》是李应试借用了道家术语。李应试并非朝鲜人。据《明史·李如松传》、《明史·朝鲜传》和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记载,李应试,字省勿,湖广人,出身于贵族家庭,在锦衣卫享有世袭的爵位。万历二十年十二月(1593年1月),皇帝派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的军队前往朝鲜抵御丰臣秀吉,李应试曾前往任参军。当时中国所派往与日本谈判的沈惟敬回到军前说款。李如松怒斥沈惟敬,欲斩之,李应试则曰:“藉惟敬给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sup>④</sup>朝鲜战事数年未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皇帝又派邢玠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抵御倭寇。“玠召参军李应试问计,应试请问朝廷主画云何。玠曰:‘阳战阴和,阳剿阴抚,政府八字密画,无泄也’。李应试答曰:‘然则易耳。’”于

① 曹婉如等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页4;参见〔日〕鲇泽信太郎《关于利玛窦的两仪玄览图》,《科学史译丛》1983年第3期。

② 曹婉如等《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辽宁省博物馆藏本长200厘米,通宽442厘米。目前此图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借阅、拍照、公开展览、新闻资料制作等依照法律必须经由文化部批准。而且像该图这样的一级文物每年只有两次从库房被取出“露面”的机会。据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称,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两仪玄览图》是清兵占领辽阳郡司(明朝地方军政管理部门)时抄获此图,一直密藏于沈阳清宫达300余年之久,直到1949年清理崇谟阁库房时才被发现。

③ 黄时鉴、龚纘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35。

④ 《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等传》,《二十五史》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页666。



是替邢玠出谋划策<sup>①</sup>。一年后，丰臣秀吉死，日本退兵，朝鲜乱平。明军班师回朝。皇帝赐给李应试湖广一处巨产，世免其税。原来他信奉利玛窦所谓的邪教，即中国的民间宗教“三函教”。且精于壬课、星命堪舆、择日等术，颇为著名，有很多的求教者。后来受到利玛窦的感化，“如梦初醒，弃暗投明”。万历三十年（1602）八月初六成为天主教徒，教名李保禄<sup>②</sup>。

李应试也是一位对地理学很有兴趣的学者。据四川人阮泰元的序，李之藻刻成《坤舆万国全图》后“挈之南游”，北京的士人听说而未能目睹，为了满足北京士人的需求，李应试刊刻了比李之藻刊本“幅愈广，述愈备”的《两仪玄览图》。利玛窦在该图序中写了如何被李应试说服重刊世界地图的经过：“友人李省勿先生，博奥无两，于霄壤间理学，无不究心。偕邹衍川、阮余吾诸君子曰：‘研几天主大道，而不止模拟两仪之虚象而已。今之演刻是图，岂非广造物之功，而导斯世识本元之伊始乎？’”<sup>③</sup>利玛窦除写有新序外，还将《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九重天图”改为“十一重天图”。《两仪玄览图》除了熊三拔在《简平仪说》一书曾提及外，很少有学者述及，可见当时流传的范围非常有限。1620年由赴京使随员黄中允带入朝鲜。

## 二、利玛窦世界地图所引入的新知识点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是明末清初中国士人瞭望世界的第一个窗口。它带来了明末中国士人闻所未闻的大量的新的知识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明清间的世界地图绘制的知识系谱都源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

### 1. “地圆说”与地球知识

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的概念。《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称：“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天地。”<sup>④</sup>古代作为贯通天地象征的玉琮，就是一种外方内圆、柱形中空的玉器，它的外部被雕成方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大地相同，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〇《外国传·朝鲜》，《二十五史》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页910。

②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页157。

③ 同上书，页158—159。

④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页762。





而它的内部又是圆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天穹相似，它的中间是空的，能够象征天地上下相通，所以在祭祀时被用来供奉天地，拥有接引神鬼的神秘力量<sup>①</sup>。大地的形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基本上是“天圆地方”或“天圆地平”的概念。中国古代宇宙观念中流行的“盖天说”，即西汉年间成书的《周髀算经》中有一个对天的解释：天是一个覆在地上的半球，天地之间相距八万里，北斗星居天之中，雨水落地，向下流到四个边缘，形成边缘的海洋。地的边缘处，天高两万里，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像个覆碗，天穹载着日、月，像磨一样由右向左旋转不停。并给天和地规定了数值：“极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万里，滂池四隕而下，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万里”，“天离地八万里”<sup>②</sup>。《晋书·天文志》中曾对这一派学说作过简要的概括：“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池四隕，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即周髀家说的：“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sup>③</sup>浑天说是在盖天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认为它始于东汉的张衡，其主要内容是：“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sup>④</sup>浑天说似乎和西方的地圆说相类似，其实这仍只是一种凭天文上的经验推出的和事实差距不大的说法，是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的认识。中国天文学上包括浑天家这一派，从南北朝的祖冲之到元代的赵友钦都没有把浑天说当成地圆解释，相反仍将它理解为“天圆地平”。因为盖天说以寸差千里的假设计算天地的尺寸，在计算时基于勾股测量，把大地当成了平面。浑天说继承了这一看法，于是出现了地是平的，又像蛋黄那样居于天内的矛盾<sup>⑤</sup>。西方地圆说传入之后，清代王夫之的《思问录·外篇·俟解》中仍极力反对浑天说为地圆说，认为“浑天家言天地如鸡卵，地处天中犹卵黄。[黄]虽重浊，白虽轻清，而白能涵黄使不坠于一隅尔，非谓地之果肖卵黄而圆如弹丸也。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

①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86。  
 ② 赵君卿注，周甄鸾重述，李淳风注释《周髀算经》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页40—41。  
 ③ 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一《天文志》，《二十五史》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页1274。  
 ④ 张衡《浑天仪图注》，洪颐煊撰录《经典集林》卷廿七，陈氏慎初堂影印本。  
 ⑤ 刘金沂、赵澄秋《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页113、116。



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谓地形之果如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sup>①</sup>。由此不难看出，“天圆地方”说与“天圆地平”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元初阿拉伯地为球形的知识曾经传入中国。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即拉施特《史集》中所说的札马刺丁, Jamal al-Din)造“西域仪象”即各种天文仪器,带来了伊儿汗国马拉盖天文台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有“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sup>②</sup>。“苦来亦阿儿子”是阿拉伯原文 Kura-irard 的音译,即地球仪<sup>③</sup>,但当时新大陆尚未发现,这一地球仪所述地球知识达到何种程度,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是这一地球仪没有附带较为详细的文字说明,更没有将这一宇宙模式与历法的修订结合起来,因此其影响显然不大,直到耶稣会士入华时为止,中国人似乎再没有提及,也没有制造过这种地球仪。

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地圆说”和地球经纬图首先是由利玛窦引入中国的,清陈庚煥著《陈惕园文录》卷二中指出:“地球之有图,始明万历中西士利玛窦。”刘献廷说得更具体:“天文实用及地球经纬图,皆利氏西来后始出。”<sup>④</sup>地理学(geography)的西方传统诞生于希腊。希腊人最早将大地理解为一个与天球有关联的球体,古希腊哲学家巴曼尼德斯(Parmenides,公元前515—前440)将地球分成数条平行圆圈,称为气候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曾用科学方法论证了地球球形说。公元2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托勒密(Ptolemy,公元90—168)完成了希腊传统中最重要的总结性著述《地理学》8卷,内容包括制图方法、资料汇编等,其所提出的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地圆说”和指出大地是一个球体。尽管古代地图没有存留,但15世纪托勒密的著作由拜占庭学者完成翻译,该书所提出的球体观念直接影响了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其所提供的坐标为世界地图的绘制

① 王夫之《思问录内外篇》,同治四年(1865)湘乡曾氏刊本,页34。

② 宋濂等《元史》卷四十八《天文志·西域仪象》,《二十五史》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页7359;参见江晓原著《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83—185。

③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年,页479。

④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页99。



提供了新动力,引导了地图学的复兴<sup>①</sup>。利玛窦在世界地图中是这样介绍西方地圆观念的:

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为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为北道。按中国在北道之北,日行赤道则昼夜平行,南道则昼夜短,行北道则昼夜长,故天球有昼夜平圈列于中,昼短昼长二圈列于南北,以著日行之界;……夫地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里之三十六分,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盖在天之内,何瞻非天?总六合内,凡足所伫即为下,凡首所向即为上,其专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且予自大西洋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已见南北二极,皆在平地,略无高低;道转而南过大浪山,已见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大浪山与中国上下相为对待(峙)矣。而吾彼时只仰天在上,未视之在下也。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sup>②</sup>

为了让中国人更清晰地了解地圆观念,利玛窦恐怕椭圆投影不足以说明地球的事实,于是他在世界地图上特地加绘了两个南北半球图。“二半球图”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两半球图。利玛窦在序言中解释道:“但地形本圆球,今图为平面,其理难于一览而悟,则又仿敝邑之法,再作半球图者二焉,一载赤道以北,一载赤道以南,其二极则居二圈当中,以肖地之本形,便于互见。”因此我们从《坤舆万国全图》上,同时可以了解到两种制图的方法——椭圆投影和圆锥投影。这种圆锥投影曾使当时的中国人惊奇不已,因此利玛窦在稍后的《两仪玄览图》刊刻南北半球图,并且补充说明道:“一载赤道以北,一载赤道以南。以赤道为圆之周匝,以南北地极为圆之心,如两半球焉。观斯,则愈见地形之圆,而与全图合纵印证,愈知理无所诬矣。”<sup>③</sup>

① 参见〔法〕保罗·柯拉法乐著,刘胜华等译《地理学思想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第二版,页22—29;潘桂成《地图学原理》,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页16—24。

②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1936年影印本。以下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图解的引文,不加专门说明的,均出自该影印本。

③ 转引自林东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辅仁大学,1983年。该文由于省略了文后的注释,使读者检验该文的观点之正误和核对其资料来源,颇受限制。



利玛窦以赤道为中心,平分地球为南北两半球,并画了南北二回归线、南北二极圈线。相应地把气候分为一个热带、两个温带、两个寒带。利玛窦这样写道:“以天势分山海,自北而南为五带:一在昼长昼短二圈之间,其地甚热,带近日轮故也。二在北极圈之内,三在南极圈之内,此二处地居甚冷,带远日轮故也。四在北极昼长二圈之间,五在南极昼短二圈之间,此二地皆谓之正带,不甚冷热,日轮不远不近故也。”这是出现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带划分法。像地球、经线、赤道、子午线、地平线等,具体而明确地运用在地球面上,利玛窦世界地图是第一次,后世的中国地理课本中都采用了利玛窦的这种地面气候的划分法和这些自然地理词汇。

利玛窦世界地图介绍的相关地球知识还有关于宇宙论的“九重天”和“十一重天”的图说,古希腊学者认为,人们所见到的日、月、星辰,运行有快有慢,离宇宙中心的地球有远有近。因此可以将整个宇宙分成若干重天,地球居宇宙的中心,固定不动,依序绕行的有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与土星,每一种运动速度的天体居一重。《坤輿万国全图》上画的是九重天图,图中说明了各重天的名称和运动的周期,在《两仪玄览图》中改为十一重天图。另外还有日食、月食图两幅和一则说明,阐明日、月食的原理。有“四行论略”一篇。该文介绍的是承自希腊爱奥尼亚学派的泰勒斯的宇宙论:天地是由火、土、水、气所组成。水是主要的元素,地球为一圆轮,浮于水面,被天所盖,其形有如拱顶。多重天的宇宙论和四元素论实际上也都是与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根本冲突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四行论与中国的五行说相似,其实,他们都与各自的世界观中的创始、人的灵魂、万物化育等问题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因此两者的冲突也是必然的。利玛窦在《乾坤体义》中对五行论中“金”与“木”作为基本元素,进行了批判<sup>①</sup>。

## 2. “五大州”与“万国”的概念

中国古代对世界的认识有一个随着时间的延伸,在空间上不断得到拓展的曲折过程。先秦时期,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很有限的,所谓“普天之下”、“率土之滨”<sup>②</sup>,就是指“中国”及四周的“蛮夷”,而“中国”则仅指黄河中下游属于中原的这部分;“蛮夷”也没有超出今天中国的北方和长江流域的

<sup>①</sup> 参见徐光台《明末西方四元素说的传人》,《清华学报》(新竹)1997年第27卷第3期;《明末清初中国士人对四行说的反应——以熊明遇〈格致草〉为例》,《汉学研究》第17卷第2期。

<sup>②</sup> 《左传·昭公七年》;《诗经·小谷北》。



中下游一带。战国时代，“天下”的区域逐步扩大。秦始皇统一中国，天下的范围延伸到了“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sup>①</sup>，东至渤海、黄海、东海，南至越南北部，西至青海东部，北至内蒙古。这就是汉代以前中国人认识的“天下”。

汉代由于丝绸之路贸易交通的发达，出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大飞跃。陆路上由于张骞的“凿空”，使人们的眼界大开，不但西越沙漠和帕米尔高原，而且远至中亚、南亚。班超和甘英的“远征”，更使人们知道了在亚洲西部、欧洲东南部和非洲东北部的罗马帝国东方的领土（大秦、骊轩）。海路上汉代和东方的日本已经有了密切的往来。但海洋世界的拓展，最重要的还是通向印度洋新航路的开辟。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时的海上丝路，已有了从南部港口徐闻、合浦，经过南中国海，向西到达印度南部黄支国的航线<sup>②</sup>。但此后直到明代中叶的1300多年间，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认识进展甚微，基本上仍停留在这一区域。其间虽出现过不少伟大的旅行家和航海家，如法显、玄奘、义净、杜环、汪大渊、郑和等，但其活动范围仍未越出这一区域。唐代和宋代与阿拉伯国家交往频繁，有很多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元朝统治者为了表示疆域之广大，准备纂修《大元一统志》，任职于秘书监的西域回回人札马鲁丁（又译扎玛里鼎、札马刺丁）建议广为搜集各地的舆图，作为编修地理图志的参考。在留存下来的元朝《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基础上，1389年完成了对西方描绘最为详细、列地名多达数百个的《大明混一图》<sup>③</sup>。中国地图研究者不断从回回人那里获取有关非洲北部和东部，以至于欧洲等广大地区的许多信息，但极少有人去过这一地区。明初郑和船队曾远航东非，《郑和航海图》也记录了东非的航路，使中国人对印度洋新航路有了比较确切的认识。但由于当时缺乏科学的测量技术，因此在地图上反映出来的，多是根据实际见闻的地理知识的映象，出现在地图上标识往往不成比例，有些不曾到达过的山岭荒漠及汪洋大海因为所知甚少，不免画得非常简略和狭小。特别是郑和以后，中国与非洲的往来又告中断，因此中国人不可能有世界意识的“洲”的概念，那些西方的“绝远”地区仍是模糊不清

①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史》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页30。  
② 班固等《汉书·地理志》，《二十五史》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页524。  
③ 李孝聪《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勘测》，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疆理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页164—184。



的。佛教传入后所带来的“四大部洲”宇宙空间观念<sup>①</sup>，没有提供确凿的地理空间想象。

《坤輿万国全图》通过数学的方法，运用圆锥投影的方法，有条件地把地球椭圆体上的经纬网，定位在平面的纸版上，把当时最新、最高水准的地理知识“五大洲”概念引入了中国。利玛窦在《坤輿万国全图》中把当时已探知的地球上的大陆用中文写道：

以地势分輿地为五大州，曰欧逻巴，曰利未亚，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曰墨瓦蜡泥加。若欧逻巴者，南至地中海；北到卧兰的亚及北海；东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若利未亚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至西红海、仙劳冷祖岛；西至河折亚诺沧。即此州只以圣地之下微路与亚细亚相联。其余全为四海所围。若亚细亚者，南至苏门答腊、吕宋等岛；北至新曾白腊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至红海、小西洋。若亚墨利加者，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微地相联。若墨瓦蜡泥加者，在南方惟见南极出地而北极恒藏焉。其界未审何如，故未敢订之。惟其北边与大小爪哇及墨瓦蜡泥峡为境也。<sup>②</sup>

- ① 须弥山(梵文: Sumeru), 又译为苏迷嚧、苏迷卢山、弥楼山, 意思是宝山、妙高山, 又名妙光山。是古印度深化中位于世界中心的山, 位于小千世界的中央(小千世界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 后为佛教所援用。传说须弥山周围有咸海环绕, 海上有四大部洲: 南瞻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这是佛教重要的宇宙空间观念。
- ② 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 禹贡学会 1936 年影印本。“欧逻巴”(Europe)起源于亚述(Assyria)人语言中的“ereb”, 是指“西方”, 与“assu”相对, 指“日没”, 后者指“东方”。两个词语都被希腊语吸收, Europe 最初指爱琴海北岸, 公元前五世纪前半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 Europe 已经成为欧洲广大地区的代名词。“利未亚”是拉丁文 Nigeria 的音译, 指非洲尼罗河以及周边国家, 代表“非洲”。亚细亚(Asia)地名起源于亚述(Assyria)人语言中“assu”(东方、日出之地), 133 年罗马帝国在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高原的西半部设置了“亚细亚洲”的行政区。之后“亚细亚”的概念不断拓展, 地理大发现之后, 亚细亚包括到中国、朝鲜、日本等东洋地区。中世纪大地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曾经也认为是平的, 于是在 7 世纪欧洲绘制的被称为“T 及 O 地图”的世界地图中, 圣城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央, 所有陆地分为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 “O”指亚、欧、非三洲形成的圆形陆地, “T”的垂直线相当于地中海, 水平线则是将亚洲和欧、非两洲分隔的一些水陆。圆形陆地的周边围以大洋, 地图的方位是坐西向东, 由地中海朝向耶路撒冷所在的东方。“T 及 O 地图”中有 africa 一词, 或以为来源于拉丁文的 aprica, 意谓“阳光灼热”之地。“T 及 O 地图”的原图出自西班牙塞维尔地区圣伊希铎助教(Bishop of St. Isidore, 570—630)为了神学教学而撰写的教材《语源学》。该书类似百科全书。书中的地图早已散失, 但是 7 世纪至 17 世纪, 欧洲地区曾出版过许多透过基督教观点, 及各时代地理知识的仿制品以诠释该图。参见[法]保罗·柯拉法乐著, 刘胜华等译《地理学思想史》,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5 年第二版, 页 29; [日]辻原康夫著, 萧志强译《从地名看历史》, 台北世潮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 页 46—49、80—82。



其中欧洲绘出的有 30 余国，如波尔杜瓦尔（葡萄牙）、以西把泥亚（西班牙）、拂郎察（法兰西）、谟厄利亚（英吉利）等；亚洲介绍了应第亚（印度）、曷刺比亚（阿拉伯）、如德亚（犹太）、北地（西伯利亚）、鞑靼、女真、古丘兹国、日本、朝鲜等。利玛窦所说的“五州”与今天的“五洲”还是略有区别的<sup>①</sup>。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划分，加上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航行到南美，肯定此为新大陆，欧洲地理学家以其名字命名“亚美利加洲”<sup>②</sup>。利玛窦的“五大州”说中，最为入诟病的就是所谓“墨瓦蜡泥加”，他的初衷原是为了介绍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和欧洲人的探险精神：“南北亚墨利加并墨瓦蜡泥加，自古无人知有此处，惟一百年前，欧逻巴人乘船至其海边之地方知。然其地广阔而人蛮滑，迄今未详审地内各国人俗。”但是在介绍“第五州”时用了不确定的说法：“若墨瓦蜡泥加者，尽在南方，惟见南极出地，而北极恒藏焉。其界未审何如，故未敢订之，惟其北边与大、小爪哇及墨瓦蜡泥峡为境也。”在图释部分加注称：“墨瓦蜡泥系佛郎几国人姓名，前六十年始遇此峡，并至此地。故欧逻巴士以其姓名名峡、名海、名地。”<sup>③</sup>此段注文指西方人将 1519 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Fernaõ de Magalhaes，约 1480—1521）越过大西洋，经南美洲大陆和火地岛之间的海峡的事迹，与当时尚未发现的澳大利亚联系在了一起，“墨瓦蜡泥加”即“麦哲伦”名字的音译。

利玛窦最早把欧洲当时通过地理大发现所形成的对世界新视阈的新知识，以五大洲与“万国”的概念介绍给了中国人，传播了当时欧洲人的世界陆地知识和方位实况，使明末士人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未知的全新的世界整体面貌。虽然其中的第五大洲尚处于不稳定的知识状态，但已经构成了欧洲人认识世界的新图式，这些新发现的叙述使对域外世界的了解处在完全模

- ① 或以为五大洲的“洲”字，是利玛窦世界地图首先使用的，这是一种误解。古代“洲”、“州”互用，利玛窦和之后的《职方外纪》和《坤舆图说》均使用“五大州”，《明史·外国传·意大利亚传》用“五大洲”，但直至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仍“洲”、“州”混用。“五大洲”一词基本稳定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专门列有“释洲”一条，比较规范地使用了“五大洲”一词。参见《五洲地理志略》，湖南学务公所宣统二年（1910）刻本。
- ② 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99 年和 1502 年两次探险新大陆，之后相继出版了书简集《新世界》、《四航海》等著作。他对新大陆的描述首先被在法国大学教授地理学的马丁·瓦德塞穆勒（Martin Waldseemüller）所接受，在他 1507 年出版的《世界志入门》（*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中指出，亚美利哥到达的是世界第四大陆，于是他建议用 Amerigo 的拉丁文 Americus 来命名新大陆。由于该书的影响甚大，“亚美利加洲”成为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用人名命名的大陆。〔日〕辻原康夫著，萧志强译《从地名看历史》，台北世潮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页 120—123。
- ③ 〔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 1936 年影印本。图中五洲中的“墨瓦蜡泥加”，并非今天澳洲，澳洲当时尚未发现，还仅仅是所知南极洲与大洋洲部分地区的想象中的大陆。



糊状态的中国士大夫,首次打破了传统的“四方”和“四海”的方域,以及佛教宣扬的四大部洲的地理图式,呈现出了一个被确切划分出来的世界面貌。由此,“万国”和“五大洲”的概念第一次被写进了清初所编修的传统正史——《明史》中,该书《外国传七·意大利亚》中明确地列出了“五大洲”的名称。

此外,利玛窦世界地图首创了一批域外译名的汉译法。地图上所标列的地名有1114个<sup>①</sup>,首创了一批通过音译为汉字的域外地名译名的汉译法。有些译名如今已被淘汰,如拂郎机(葡萄牙)、拂郎察(法国)、谟厄利亚(英国)、大浪山角(好望角)等。但也有一些洲名、国名和地名的译名则沿用至今,如亚细亚、大西洋、地中海、尼罗河、罗马、罗马尼亚、那波里、古巴、巴布亚、加拿大等。有的今译名则脱胎于利玛窦的译名,如欧逻(罗)巴、亚墨(美)利加、牙卖(买)加、马路(鲁)古、智里(利)、泥(尼)罗河等。但同时利玛窦以麦哲伦的航海事迹来作为“未审”、“未订”的南方大陆命名,使原本具有探险英雄文化内涵的意蕴变成了一种“荒渺莫考”的“传闻”,这成为后来士大夫攻击其世界地图的一个重要的借口。

### 3. 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点的透露

美国学者丹尼斯·伍德(Denis Wood)在《地图的力量》一书中指出:地图“是一个文化产物,是在选择之中从事选择的积累,其中每一个选择都揭示了价值: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切片;不是自然,而是对自然的一种观点;不是纯真无邪,而是承载了意图和目的;不是直接的,而是穿透了玻璃;不是坦直的,而是由字句和其他符号做中介;简言之,不是如它所是的东西,而是在符码之中”<sup>②</sup>。同样,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介绍的也并非完全是经验的再现。如在对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的介绍方面,就有着很大的选择性。他在介绍欧洲地理时特别强调欧洲宗教政法与物产习俗的重要性:“此欧逻巴洲有三十余国,皆用前王政法,一切异端不从,而独崇奉天主上帝圣教。凡官有三品,其上主兴教化,其次判理俗事,其下专治兵戎。土产五谷、五金、百果,酒以葡萄汁为之。工皆精巧。天文性理,无不通晓。俗敦实,重五伦。物汇甚盛,君臣康富。四时与外国相通,客商游遍天下。”在介绍意大利亚时指

① 黄时鉴、龚缨晏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一书附录“地名通检”列出地名共1114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183;但同书页91又称“图上有1113个地名”,此取“地名通检”部分的统计。

② [美]丹尼斯·伍德著,王志弘等译《地图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页172。





出：“此方教化王不娶，专行天主之教，在逻马国。欧逻巴诸国皆宗之。”在介绍德意志公国入尔马泥亚（拉丁文 Germania，今译德国）时指出：“入尔马泥亚诸国，共一总王，非世及者，七国之王子中，常共推一贤者为之。”被中国称为“小西洋”的“应帝亚”（即印度）也是“天下之宝石、宝货自是地出，细布、金银、椒料、木香、乳香、药材、青朱等，无所不有。故曰时有西东海商，在此交易”。即使在文化落后的利未亚（非洲）也有像中国一样优越的地理环境：尼罗河“天下惟此江至大，以七口入海，其国尽年无云雨，故国人精于天文。其江每年次泛涨，地甚肥泽，如粪其田，故国人种之五谷以一收百，国称富饶”。其洲中有“末罗郭”，“此城为天下极大城，行十里程，地产宝石鸟木”。近赤道的那些国家“人身尽黧黑，不服衣裳，发皆卷短，土不产铁，而产金银象牙、犀角宝贝之类”<sup>①</sup>。显然，选择介绍这些内容有着深刻的用意，目的都是为了让中国人知道，在远离中华文化的“绝域”，同样有着与中国一样富饶的土地，也有着完全可以与中国声教仪章相媲美的礼乐教化，还有着影响波及整个欧洲的圣教——天主教。

对异域知识了解的多少取决于海外交通空间幅度的大小，历史上的域外交流为中国带来了葡萄、玻璃、狮子，但具体物质的引入只是在生活层面上的“互通有无”，珍奇异物也只是满足了一部分贵族的好奇心。只有来自异域文明的信息，才会使交流由浅入深；对异域文化的深刻认识，会引起自身某种程度的文化震动。中国传统有“绝域”的说法，但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泛指遥远的某一个地方，或很多地方，没有明显的确定性空间，而利玛窦首次用“泰西”指称欧洲，表示一个确定的方位和地区，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参照系。利玛窦世界地图中对西方人文知识点的透露，使中国士人认识到，在同一时空的遥远国度中，存在着另一些如“泰西”一样的文化，是足以与自己相等，甚至更深厚、宏大的文明。

#### 4. 实地测量和地图量算的新方法

中国地图出现的时间很早，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中，已经有了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西晋裴秀创制制图六法，规范了绘制地图的标准图式，奠定了中国地图绘制学的基础。尽管元代以前中国已经有了纬度和子午线长度的测量，但“天圆地方”的观念使测量的结果仅仅只是为了从天文角度了解地面方位，与地图绘制关系不大。一直到明朝，除了计里画方之外，地

<sup>①</sup> [意]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 1936 年影印本。



图绘制术未有突破性的进展。在中国将近代西方新的科学方法和仪器用于实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的，利玛窦是第一个人。

利玛窦来华前，就对实地测量有着浓厚的兴趣。应用西方投影法绘制地图，首先必须确定某地的经纬度，他在来华的途中就沿途测量当地应在的经纬度，在赤道处观测南北极与地平交角。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中写道：“其经纬线本宜每度画之，今日惟每十度为一方，以免杂乱，依是可分置各国于其所。东西纬线数天下之长，自昼夜平线为中而起，上数至北极，下数至南极，南北经线数天下之宽，自子福岛起为一十度，至三百六十度复相接焉。试如察得南京离中线以上三十二度，离福岛以东一百廿八度，则安之于其所也。凡地在中线以上，主北极，则实为北方。凡在中线下，则实为南方焉。”<sup>①</sup>1582年利玛窦来到澳门，就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地理，从事实地测量。之后他每到一地，都注意测量经纬度，如1584年9月13日他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的信中称，他在澳门和肇庆根据两次月食，用意大利的尺寸测定了纬度<sup>②</sup>。在深入中国内地的长途旅行中，他一路不断进行地理观测，比较精确地实测了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济南等城市的纬度，从测得北京、南京等中国城市的经纬度值来看，纬度值与现代值还是相当接近的<sup>③</sup>。定居北京后他再度观测中国的经纬度，称中国南部边界起自北纬19度，北部长城位于北纬42度；西部边界始于经度112度，东部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经度131度<sup>④</sup>。利玛窦在地图上绘出了在子夜和正午测定地理纬度的方法，把经纬度的意义与用法介绍给中国地理学界。他说明如何使用量天尺(astroble)，通过量天尺的两孔圆来进行观察，图上附刻有“太阳出入赤道纬度表”，使整幅地图的精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美国学者史景迁认为，利玛窦对纬度表的精确推算，得益于他的老师克拉维斯的《天文学》(Sfera)和亚里山德罗·皮科洛米尼(Alessandro Piccolomini, 1508—1578)的《宇宙天文学》(Sfera del Mundo)，这两本书是利玛窦旅途中的常备书。特别是克拉维斯的著作，不仅仅是一本理论书，还指导学生使用各种器材<sup>⑤</sup>。

① [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1936年影印本。

② 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46。

③ 参见冯立升《中国古代测量学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231—232。

④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7—8。

⑤ [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著《利玛窦的记忆之宫》(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纽约Viking Penguin Inc.，1984年英文版，页148。



实地测量使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中国与东亚部分的地理事实的真实性和纬度的确定,其精确性都要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所刊出的世界地图。即使亚洲的其他部分,如日本四岛被安置在30度至42度之间,虽然比实际纬度要误差3度,但比较1569年麦克托的世界地图和1570年奥代理的亚洲地图,其准确性就显得非常突出了。16世纪欧洲制图学者所使用的有关亚洲的地理资料,主要是参考意大利或法国旅行家的报告,而由于这些旅行者因缺乏经纬度的测量,其报告往往对地理位置的确定非常模糊。所以利玛窦通过实测所绘制的地图远远胜过它们,就不是偶然的了<sup>①</sup>。这种方法比较中国古代传统的“计里画方”定位法,要精确得多。利玛窦以其所谓量天尺(astrolable)测各地的纬度,又利用日月食以测经度,所得结果与现今所测相差无几,是中国地理学上空前之工作<sup>②</sup>。这种实测的结果不仅澄清了欧洲长期流传的一些关于中国的模糊观念,最重要的是这种实验的态度为中国地图学提供了全新的方法。

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地图好比镜子,是真实世界某个层面的图像再现。同时,地图所指示的还有地图创制者的“内在表意功能”,即地图也是一种叙述,它会不可避免地呈现着创制者的学识、注意力、想象力,甚至艺术观点,当然也包括了创制者的成见与偏见。因此,地图所展示的世界不完全是世界的本身,而是创制者对世界的叙述。利玛窦从中国人最易接受的角度出发,改变了欧洲制图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即将福岛本初子午线从世界全图的中央向左移动170度,放置到原奥代理世界全图的190度经线之上。这种移动的结果是使原来被绘制在奥代理世界全图极东的中国,出现在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中央部分。以往许多学者批评利玛窦这样做是为了迎合明末士人妄自尊大的观念,是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屈服。其实各种文化圈都有自己的“中心”,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士大夫要求把中国绘在世界地图的中心给予太多的责备,问题是是否愿意把自己的“中心”纳入互相重叠的世界范围之内。利玛窦世界地图用相对密集的语言、字标、图像描画了复杂的三维世界,让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了中国只是这个复杂的三维世界中的一部分,中国不再雄踞世界的中心。利玛窦世界地图以实证的方法记录了时空向度中质与量的各种比较准确的地理和文化信息,用空间秩序的信息

① 林东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辅仁大学,1983年。

②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页107—108。



记录了土地、海洋、五带等自然地理的资料,显示了欧洲航海来华的海上航道等;选择了时间秩序的信息报告了部分人文地理的资料,如欧洲的法政、宗教、习俗等,表明了“万国”并非是散落在中国边缘大海中的所谓“四夷”小邦,而是可以与中国同等并列的世界诸国。当然,利玛窦世界地图中还蕴涵了西方科学的实测方法和追求精确性的科学精神。从这种意义上说,利玛窦世界地图刊刻所带来的新的异质的知识资源,对传统中国思维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 三、明清间士人对世界地图的回应和早期“世界意识”的形成

毫无疑问,利玛窦世界地图是明清士人理解整个世界的重要窗口。明末清初的用图者对利玛窦世界地图图像有着怎样的视觉效果和认识特征的感受呢?作为绘图者的利玛窦通过图形、符号、色彩等与地图的接受者有着怎样一种互动关系呢?

姚旅在《露书》中特别提到“珣玛豆善天文,所著图与中国颇异”<sup>①</sup>。这个图显然是指天文图和世界地图。明末清初摹刻利玛窦世界地图者不乏其人,除了失佚的赵可怀、郭子章的刊本外,可以找到的有冯应京《月令广义》(1602年)中的《山海輿地图》,王圻《三才图绘》(1609年)中的《山海輿地图》,程百二《方輿胜略》(1610年)中的东西两半球图,王英明《历体略》(1612年)中的以地球为中心的《九重天图》,章潢《图书编》(1613年)中的《輿地山海全图》等,潘光祖《汇辑輿地备考全书》(1633年)中的《缠度图一》和《缠度图二》,熊明遇《格致草》(1634年)中的《坤輿万国全图》、《九重天图》,熊人霖《地纬》(1638年)中的《輿地全图》,揭暄《璇玑遗述》(1675年)中的《昊天一气浑沦变化图》和游艺《天经或问》中的《随地天顶子午之图》等。

我们注意到,这些摹刻者有的是按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原形进行摹绘,以便辑入自己个人的著述。这种工作的性质尽管不属于真正的研究,但其对各版世界地图原形的保存与流传有明显的作用。不少摹刻者并不讲求近代欧洲制图的理论方法,也不关注16世纪的世界地理发展。因此,他们的工作显得非常粗糙,科学价值不高。如程百二在东西两半球图上刻满了大约500个地名,密密麻麻分布在五大洲之上,令人眼花缭乱。何况,在这些地

<sup>①</sup> 姚旅《露书》卷九《风篇》中,《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11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页670。



名中还存在有许多错误,如亚墨利加有 14 个、利未亚有 5 个、墨瓦泥加有 3 个。潘光祖的摹刻又有许多新的错误。章潢似乎没有使用任何制图工具,洲陆海洋的区分也是混淆不清的<sup>①</sup>。一位名叫梁辇的学者,在 1603 年或 1605 年曾刻有《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是综合中外地图的方法而进行的绘制,图中列入了利玛窦世界地图中所提到的所有地名,而同时又保持中国传统的正方形,并在图中画上大量古怪的标记,甚至在黄海上画了一棵树<sup>②</sup>。这些翻刻工作的目的正如潘光祖所言:将利玛窦世界地图放在诸舆图之前,“俾人知九州之外更有如是之大”<sup>③</sup>。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不准确的图多少反映了明末知识阶层——士人对于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欢迎态度。

中国历史上有过漫长的“自我为中心”的时代,这种“中心”模式是一个方位、层次和文化交织的框架。首先,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是“天下之中”。即使被认为“闳大不经”的邹衍的“大九州”之说和被目为荒诞不据的《山海经》,在描述天下的时候,也不外以东、西、南、北、中以及内外来区别天下的方域和山海。这种“天下观”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最东部,西北是荒野沙漠,西南是高山深谷,南面热带丛林,东临汪洋大海,地理上的相对封闭使中国士大夫不仅视中国为天下的中央,而且在文化上处于中心的地位,中国文化被视为普天之下最高的文明的样式。战国时期,赵国的公子成这样阐述过作为文化中国的意义:“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

① 林东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辅仁大学,1983年。该文此处将“潘光祖”误写为“潘广祖”。

② [法]米歇尔·德东布《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的地图学》,[法]安田朴、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年,页227—229。李孝聪认为《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有常州府无锡县儒学训导梁辇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镌刻,于18世纪被来华耶稣会士携至欧洲。此图曾参考过罗洪先的《广舆图》、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及奥尔蒂利《舆图汇编》,是一幅以中国为中心,以小岛的形式罗列其他国家地名于四周来表示天下的中文世界地图。在各地以简要文字标注有关政区沿革、历史人物和名胜古迹,图的下端列出,明代两京十三省的府、州、县数目,以及各地户、口,应交纳的米、麦、丝、绢、棉、布、马草和食盐的数额,此图代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同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念在制图学方面的结合,但没有跳出中国舆图的传统形式。(参见李孝聪《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疆理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页175)所谓“奥尔蒂利《舆图汇编》”显然就是奥代理的《地球大观》(Abraham Orteliu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而1593年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尚未完成,估计参考的可能属于《山海舆地图》这一系列的世界地图。

③ 潘光祖《汇编舆图备考全书·凡例》,《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21册,页465。



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sup>①</sup>宋代理学家石介的《中国论》最能代表中国士大夫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明优越感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轻视：“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sup>②</sup>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形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裔<sup>③</sup>。这就是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在中国创造的属于自己的特殊的文化体系——夷夏传统。所谓“夏”是指孕育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夷”则是指处于这个中心四周的部族，是不知华夏文明、未受礼仪熏沐的少数民族，依其与中原所处的方位，分别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四方的部族，在中国士大夫的眼中，处于没有声教礼仪的野蛮状态。

从汉代到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的 1 300 多年间，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认识进展非常缓慢，使“四海之内”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不断地强化为一种“虚幻环境”<sup>④</sup>，这在中国历代刻印的“华夷图”、“广舆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从北宋神宗时的《华夷图》碑到罗洪先的《广舆图》，都把周边国家的位置标得模糊不清，中国的区域画得颇大，而汪洋大海却绘得很小。有无大地球形观后来就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一个重要的差异。哥伦布正是因为坚信地球是圆的，才能面对浩瀚的大海勇往直前，而郑和下西洋时，中国人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大地球形观，他们不可能有通过绕地球一周重回自己家园的观念，那么，只觉得愈往西就愈远离故土，加上中国人乐于安居而缺乏强烈的冒险精神，因此，尽管明末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发现新大陆的高水平的航海条件，但缺乏这种发现的意愿。

利玛窦一踏上中国土地时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中国人认为他们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接壤的。与他们国家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

① 王锡荣等注译《战国策·赵策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页517。

② 石介《中国论》，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页116。

③ 参见《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三联书店，1991年，页453—454。

④ “虚幻环境”(pseudo-environment)一词是W·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舆论学》(*Public Opinion*,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U. S. A., 1965)一书中提出的，指人们以符号为媒介在头脑中虚构的行为环境，是与现实环境即地理环境相对照的象征性环境。林珊将此词译为“假环境”。(参见《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页9—10)



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他这样评论明代人绘制的舆地全图：“据说是表示整个世界，但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四周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加在一起还不如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羨。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sup>①</sup>利玛窦没有直接将中文版世界地图献呈万历，主要也是担心皇帝看到世界地图中的“大明”居然这么小会大发雷霆，责怪利玛窦藐视中国人。但出人意料的是，利玛窦送给太监的中文版世界地图由太监进呈给万历后，这位不上朝的皇帝竟然非常喜欢，传旨命献六轴十二幅绸印的世界地图，并把这些绘制精美的地图赏赐给太子和皇亲，让他们装饰住宅。同时要求利玛窦继续复制。利玛窦认为：“皇帝这样优渥看待我们的一件作品，并不是不足道的事情，既然当时许多人予以小看，而且根本不相信……特别是在谈起基督教、驳斥其他教派的谬误的时候。这些地图恒常放在皇宫大殿里，于是，我们可以指望皇上或太子或其他皇族成员会凑巧来好奇地询问我们的神圣信仰。事实上，我们也只有这一个办法同他们沟通，既然他们不与外界有任何交往。此外，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国家比起许多别国来是那么小，骄横可能会打掉一些，会屑于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sup>②</sup>应当说，利玛窦的这一努力取得了成果。

### 1. 新知的接受和从“地理视界”到“文化眼界”的拓展

“地图的知识就是孕育地图形成之世界的知识，这就像铸件从模型而来，鞋子由鞋楦而来一样，显现出这个努力制造地图的社会里，每件事物的异质同形的相对图像。”<sup>③</sup>利玛窦世界地图所呈现的知识，就是西方社会建构出来的知识。地圆说的地球意识改变了传统的天圆地方或天圆地平的观念，地球是球形的，在自然空间认识上就形成了超越传统的大地有东、南、西、北和上下左右的二维观念，而建立起三维方位的观念，而二维方位词是

①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6、179、181。

②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1993年，页557—558。

③ [美]丹尼斯·伍德著，王志弘等译《地图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页25。



传统尊卑意识的基础。地球的三维观念的形成,明确了大地有内外、核心和边缘、旋转运动和表面无中心的特征。自然界,即大地不存在空间上的中心,推而言之,文化上也就没有中心存在的基础,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所引起的冲击有着极大的震撼力,这也是后来《圣朝破邪集》和《不得已》中猛烈抨击“地圆说”的原因。

利玛窦世界地图将传统的“万国”予以全新的界定:古代中国也有“万国来朝”,但这是指“殊方”,即不同的地方,主要指周边藩属;而利玛窦的“国”有主权国家的含义,用于表达世界存在着的诸多政体国家,这是后来国人能够接受世界多元种族和文化存在的空间基础。但“万国”概念的传入与是否被准确的理解,是两回事:承认万国,同时可以认为自己是万国中独尊之国,仍是万国的中心;而利玛窦所传送的世界意识是将“万国”中各国都视为其中之一国,中国同样不例外。与“万国”同时介绍的“五大洲”概念,最早将“洲”的概念引入,阐明了中国仅仅是世界,乃至“亚细亚洲”的一部分,不仅不是想象中的世界中心,而且即使在亚洲也不存在一个中心。这种地理观直接和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天朝中心主义的世界观。

利玛窦世界地图所传入的地圆意识、万国观和欧洲新知识点,首先使中国士大夫开始反省自己的天下观,他们在清楚划分的五洲、分明的经纬度和到处写满了国名的世界地图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从惊羨、好奇到反感、拒斥,而最终产生了对原有“虚幻环境”的深深疑虑。

“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还这样写道:“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羨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图。……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大不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够加以研读,以便作出更好的判断。”<sup>①</sup>确实有不少中国士大夫由于接触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而逐渐接受了耶稣会士带来的这种“世界意识”。如徐光启于1600年春在南京先后

①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179—180。





接触了赵可怀和吴中明两位进士所刻的利玛窦的世界地图<sup>①</sup>，他在《跋二十五言》中写道：“已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乃知有利先生焉。间邂逅留都，略借之语，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sup>②</sup>渐渐为利玛窦所带来的球形大地观所吸引，认为“西泰子之言天地圆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并为地圆说作了正、戏、别三论详细加以解说<sup>③</sup>。李之藻说自己在1601年“从寮友数辈访”利玛窦，“其壁间悬有大地全图，画线分度甚悉”，以后便醉心于西方的制图学，指出中国传统图学的缺陷，“余依法（利玛窦教授的西法）测验，良然。乃悟唐人画方分里，其术尚疏”。叶向高称利玛窦当年“画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人愈异之。……其言舆地，则吾儒亦有地如卵黄之说，但不能穷其道里、名号、风俗、物产，如泰西氏所图记”<sup>④</sup>。

利玛窦说有些士大夫“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教育的人却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当于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再者，他们得知五大地区的对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到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这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从此之后，他们对欧洲的教育制度有了更高的评价”。这些西书对于中国士大夫来说，的确是全新的东西，传教士们“把附有描述性地图的书或者用图表和草图说明的建筑模型拿给这些人看时，他们都感到高兴和惊诧。整个国家连同城市、宫殿、高塔、拱门、桥梁、大庙等等在一本书中一览无遗，这种概念他们简直惊奇不已。他们对能够目睹这些分散那么广而彼此相距那么远的光辉事物，而且能够在自己家里饱览它们，真是惊叹不已”。“他们终于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而抛弃了“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的“错误看法”<sup>⑤</sup>。秀水虞兆滌（虹升）在《天香楼偶得·天学》中认为西洋的“地圆说”不同于传统的“盖天”、“宣夜”和“浑天”三家，并强调了地圆所形成的角度的相对性：“西洋之学又云地形如一圆球，凡一切流峙动植之物，皆粘吸于球上，故海水绕球而流，人物环球而生。于是有正者、倒者、横

① 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64。

② 《跋二十五言》，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页86。

③ 《题万国二图图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页63。

④ 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叶向高《职方外纪序》；〔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页6、13。

⑤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181、216。



斜者。而天则虚空笼罩球外。由正者而视倒者，是地下有倒覆之天也；由正者而视横斜者，是地旁有侧覆之天也。然在倒与横斜之处视之，则依然天在上，而地在下，但相去甚远，以渐而不觉耳。”<sup>①</sup>地球无正倒横斜，中国当然就谈不上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这种对“自我为中心”的“虚幻环境”的疑虑和对“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世界意识”的认同，突出地表现在一些士大夫为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职方外纪》所写的序言里。17世纪的地理学家孙兰在1693年完成的《柳庭舆地隅说》自序中写道：“吾中国土地在大地中止东南一隅，合华裔而统计之，才八十一分一耳。”他将全球划分为三个大区域，即“三大殊方”，“谓南极、北极与赤道也”，并具体描述了其气候与地文特征；在《大地山河图说》中还以图文并用的形式传播了西方的地圆说等地理知识<sup>②</sup>。

葛兆光指出：古代中国关于“天”和“地”的空间叙述中，隐含了古代中国历史传统的权威性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依据。如果大地不再是圆形的“天”覆盖下的方形，那么过去的历史和传统的经验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四夷不再是地理上那么渺小和文化上那么野蛮的附属之国，“天朝大国”的自信、中央王朝的尊严就会受到动摇。“整个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合理性依据，与传统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密切相关，当这种传统的合理性依据被西洋传来的新知动摇，很多旧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坍塌。”<sup>③</sup>

空间观念的改变会导致思想界的“革命”。章潢在《图书编》的《舆地山海全图叙》中就感叹地理知识带给自己对于知识理解的无穷追求：“尝闻陆象山先生悟学有云：原来只是个无穷，今即舆地一端言之，自中国以达四海，固见地之无穷尽矣！”<sup>④</sup>地理视界的拓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眼界的拓展。明末清初的一些士大夫开始跳出“虚幻环境”，承认天下确实还存在着一个未知世界的“文明”样式，企图用一种平等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化的短长，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许对西学并无太多的认识，但由于与新地理观的接触引导他们认识了异域文化，从而建立起了一种健康和开放的心态。如通政司许胥臣曾坦率地告诉王丰肃，他一点也不喜欢《天主实义》，但王丰肃送给他

① 参见吴震方编《说铃》后集。

② 参见韩光辉《孙兰的地理学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11卷，第3期。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458、492—493。

④ 章潢《图书编》卷二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页552。



的一架地球仪和《坤輿万国全图》却引起他浓厚的兴趣，许胥臣因此地理观的吸引而接受了天主教文化，成为当时官阶最高的一位中国教徒<sup>①</sup>。明末学者谢肇淛更是在《五杂俎》一书中直接写道：“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sup>②</sup>是否通晓文理、温文尔雅历来是中国士大夫用来区别华夷和文野的标准，此时谢氏将其用之描述远在佛国之西的天主教国家，实际上已把天主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了。米嘉穗在为刻于1637年的艾儒略《西学答问》所撰的序文中这样说道：

吾人睹记所及，尝不若所未及。《中庸》语道之至，至人所不知，所不能，非其心思域之，抑亦耳目限之也。学者每称象山先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之说，然成见作主，旧闻塞胸，凡纪载所不经，辄以诡异目之。抑思宇宙大矣，睹记几何？于瀛海中有中国，于中国有我一身，以吾一身所偶及之见闻，概千百世无穷尽之见闻，不啻井蛙之一窥，萤光之一照也。乃沾沾守其师说，而谓六合内外，尽可不论不议，此岂通论乎？<sup>③</sup>

这种对于不同于旧闻的外来事物，不是采取简单地斥之为诡异一概否定，而是主张不固守师说的虚怀若谷的境界，读来令人赞叹不已。编辑《昭代丛书》的张潮（1659—1707）学习了西方地理学后指出：“泰西之言以大地为圆球，上下四方皆成世界。洵如所云，则所为泰西者，亦第自中华言之；苟就彼地而论，安知其不自以为中，而反以中华为东耶是？”事实上否定了中华天朝中心主义观念，他心目中的西方世界是：“其人则颖异聪明，其学则星历医算，其俗则忠信耿直，其器则工巧奇妙，诚有足令人神往者。”他还幻想自己“身如飞鸟，忽生两翅，遍游海外诸国，览其山川人物之奇，文字语言之异，朝西暮东，倏忽万里，此身亦更不复知有饥渴。”<sup>④</sup>

## 2. 历史的记忆和经验的证明

利玛窦通过“地球”、“万国”、“五大州”、“亚细亚”、“泰西”等这些概念，把一个确凿无疑的世界，以整体的面貌呈现给中国人。明末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入激发了许多士大夫钻研传统地学文献，如编纂《图书编》的章潢描

① [意]利玛窦《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利玛窦全集》第二卷，台湾光启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530。

②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中华书局，1959年，页120。

③ 《西方答问序》，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页300。

④ 张潮《昭代丛书》甲集，卷二十七“西方要纪小引”、卷二十六“外国竹枝词小引”，道光癸巳（1833年）版。



摹了利玛窦带入中国的某种西文世界地图，误认为是天文图，于是他在中国故纸堆中找了一个标题，命名为《昊天浑元图》<sup>①</sup>。而利玛窦在绘制《坤舆万国全图》的过程中，也大量参考与利用中国的传统文献。早在1918年，翟林奈就指出《坤舆万国全图》中有些资料来自《五代史》、《魏书》和《隋书》；甚至采自罗洪先的《广舆图》、《大明一统图》等。利玛窦还特别重视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全图中有若干材料直接参引了《文献通考》<sup>②</sup>；有关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注文，许多取自严从简1574年所撰写的《殊域周咨录》和1591年罗日戛的《咸宾录》<sup>③</sup>。关于日本的地名有些则采录了明人胡宗宪的《筹海图编》<sup>④</sup>。

接受新知的过程同时也是调动本土历史记忆的过程。当利玛窦世界地图展现在士人面前时，有些人在惊骇之余，迅速地调动起本土历史记忆中的异域知识，并在传统的历史文献中发掘对应或者近似的知识，努力将新知与旧学联系在一起，他们以利玛窦输入的西方地理学的资料与方法来反省中国的古代经典。如祁光宗直接赞扬利玛窦世界地图“据所闻见，参以独解，往往言前人所未言至。以地度应天躔，以读天地之书为焉己之学，几于道矣”。杨景淳认为《禹贡》、《汉书·地理志》虽“靡所不具，此其大章明较著者而质之六合，盖且挂一而漏万，孰有囊括苞举六合如西泰子者？详其图说，盖上应极星，下穿地纪，仰观俯察，几乎至矣”<sup>⑤</sup>。郭子章在《黔草·山海舆地全图序》中比较深刻地阐明了利玛窦图说对于理解传统宇宙观的意义：

驹行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禹序九州之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名九州，有大瀛海环其外，实天地之际焉。其说盖出于《括地象》及《山海经》，而马迁乃为闳大不经。张骞穷河源，悉睹昆仑，桓宽、王充，议其迂怪虚妄，荧惑诸侯。比晋太康汲冢竹书出《穆天子传》载穆王袭昆仑之丘，游轩辕之宫，勒石王母之山，纪迹玄圃之上，然后知驹子之语，似非不经，而马迁所

① 龚缨晏《欧洲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地图学的证据》，氏著《求知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页397—407。  
② 陈观胜《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禹贡半月刊》第5卷（1936年）第3、4合期。  
③ 赵永复《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所引用的中国资料》，《历史地理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④ 林东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辅仁大学，1983年。  
⑤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1936年影印本。



云，张骞未睹者，原非乌有。……四千载后，太西国利生持《山海舆地全图》入中国，为驸子忠臣也。则以任证书也，非若竹书之托空言也。利生之图说曰：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故有天球，有地球，有经线，有纬线，地之东西南北各一周九万里，地之厚二万八千六百余丈[里]，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此则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者，而暗与《括地象》、《山海经》合，岂非驸子一确证耶。<sup>①</sup>

较早接触过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晚明士大夫李日华将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新知识与融入中国文化的佛教世界观相联系，指出：“近日利玛窦所作寰宇图，欧海诸处，实系海中诸洲屿，乃四洲之部属，绕昆仑麓而错处者。天地之辟久矣，风气日开，不唯中国人远涉遐异，而荒服之士亦往往梯航而来，闻见互质，诚得合前数种，又参以职方所领志乘，所载与夫山经地疏航海之编辘轩之录，而运以千秋卓犖之笔，自成一书，亦大快也”<sup>②</sup>。

王英明在《历体略》中称，开始他对地圆说等“不能无骇且疑，徐绎之，悉至理也”，他采取了儒者注经的方法，从古代典籍中搜集了13条证据，虽然这些“证据”均为似是而非的说法，但他希望读者接受地圆说，可谓用心良苦<sup>③</sup>。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也力主地圆说可以在《周髀算经》中找到论据。其子方中履所编《古今释疑》十二卷《天地之形》中，引用了《坤舆万国全图》的“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的话，并把《黄帝素问》、《周髀算经》以及邵雍、朱熹都请出来作证，证明“中国之说本明，至利玛窦入而始畅”。这些历史的记忆和感觉的经验一起，成了接受西学的心理支持，因为在经验可以证明的范围内，人们渐渐相信西洋人的说法是有道理的<sup>④</sup>。可见明末西方地理学作为一种新知识点，已被部分士人所认可，并且他们努力重新发掘传统的知识资源，通过比较将它整合到传统这一庞大的知识体系之中。

但从总体上来看，明末以来，除了少数的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吴中明、李应试、孙兰等那样能在地理学的层面上对利玛窦输入的西方地理

① 转引自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第5卷（1936年）第3、4合刊。

② 李日华《紫桃轩杂辍》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08册，齐鲁书社，1995年，页39。

③ 陈东美等《明末清初西方地圆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反响》，《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2000年）第1期。

④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462—463。



学作出若干对话外，绝大部分的学者仅仅只是粗浅的吸纳而已，还算不上是对新的知识图式真正的学术回应。有一些只是出于好奇，视世界地图为新鲜玩意儿，对地图的内容往往一知半解，像《三才图考》等的翻刻，错漏百出。清初对利玛窦等输入的西方地理学新知识没有进行深一层的研究，而且一些非常有学问的史学家在回应西方地理学方面，却表现出学术上的盲目和武断。《明史·外国传·意大利亚传》称利玛窦的《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指出中国仅为亚洲的一部分，且“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同时作者认为“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sup>①</sup>。万斯同的《明史稿》也作“其说荒诞不可信”。王鸿绪据其文而删订后持同样的观点<sup>②</sup>。以音韵、文字、训诂为中心来诠释古代经典的乾嘉考据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对传入的西方地理学却抱着疑信参半的心态，如《四库全书总目》的总纂纪昀一方面评论《坤舆图说》中有关罗得岛上的铜人巨像“跨海而立，巨舶往来出其胯下者”，是属于东方朔的《神异经》之流，但也指出“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存广异闻，固亦无可也”<sup>③</sup>。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纪昀等校订的《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八《四裔考》六“意达里亚”批评《职方外纪》“以千余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国风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华所及者，虽荒远狂獠，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而即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诬”。在《四裔考》的“博尔都噶尔亚”（即葡萄牙）中又称：“自利玛窦始为全图，流传中国，厥后庞迪我翻刻西洋地图，衍为图说，艾儒略辑为《职方外纪》，其言未免夸张，正《庄子》所云存而不论者。”<sup>④</sup>但客观的经验又证明利玛窦所提供的世界图式的确有很大的可信度。于是，这种无法直接从知识立场上进行反驳，不得不正眼看待经验事实，却又冷眼鄙视新知的复杂心态，使明末清初的士人无法在面对西方地理学时自觉地追求真实性和确凿性，从而不断引入新的知识点。这种以传入的新知识来回应和激活旧传统的做法，至晚清王仁俊撰写《格致古微》一书，称“地圆之说，本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极而言之，就是“西法

① 《明史》卷326《外国传·意大利亚传》，《二十五史》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页927。

② 参见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130、194。

③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中华书局1997年，页980。

④ 刘锦藻编《清朝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7470—7471。

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



070

彼曰东来胚胎，中书不胜枚举”<sup>①</sup>，堪称达到极致。

### 3. 政治权力意识和士人的非学术回应

因为中国“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解释系统，是同政治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许多士人热衷于将有关地理的学术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从维护道统的角度对利玛窦进行辱骂，其重心仍不外旨在担心新知识瓦解传统经典的神圣性，以维护天朝为中心的“虚幻环境”。魏潜的《利说荒唐惑世》一文称：“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舆地全图》，及洗洋窄渺，直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sup>②</sup>林启陆在《诛夷论略》中指责利玛窦的所谓地圆说颠倒了上下的时序：“又谓地形如鸡蛋黄精，上下四旁，人可居住，足踵相对，人可旋转而走，遂以本天亲上，本地亲下，此二语，谬会其理，以欺愚顽。”而在这种观点支配下设计出来的历法，必然要导致“藏时失序，上下倒置，庶民得以临驾乎卿士师尹之上，卿士师尹得以临驾乎主君之上也”<sup>③</sup>。李维桢《方輿胜略序》中称：“余尝观司马传驸衍作迂怪之谈，列中国名山、大川、广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所不睹，谓中国于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王公大人奇其言而尊事之。顷有化外人利西泰为山海图，狭小中国，略与衍同，而冯盱眙称之，无乃吊诡之过欤？”<sup>④</sup>杨光先在《肇镜》中把西洋历法在中国流行的根子归咎于世界地图的传播：“新法之妄也，其病根起于彼教之舆图，谓覆载之内万国之大地，总如一圆球，上下四旁布列国土，虚悬于太空之内。故有上国人之足心，与下国人足心相对之论。……此荒唐之说，不但知历者信之，即精于历法者，亦莫敢不信之。”他指出，将万国分一半于地上，一半于地下，事实上“明谓我中夏是彼西洋脚底所窜踰之国，其轻贱我中夏甚已！”他认为那些对“地圆说”折服的都是“无识者”，因为“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可见大地之

① 王仁俊《榕致古微》，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九辑 15 册，北京出版社，1998 年，页 72。

② 徐昌治辑《圣朝破邪集》卷三，参见夏瑰琦整理本，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 年，页 183—184。

③ 同上书，页 284—285。

④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150 册，齐鲁书社，1997 年，页 609。



非圆也”<sup>①</sup>。

最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根本不相信地圆说，如《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就反对西方的大地球形观，认为“西人以地形为圆球”说使“天体受诬，又酷于宣夜与周髀矣”<sup>②</sup>。曾为利玛窦《交友论》一书作润饰的江苏学者王肯堂，虽然同意利玛窦的大地球形的观念，并把“西域人利玛窦言日体大过于地”作为“确乎不可易”之论写在自己的笔记中，但在地理概念上仍把欧罗巴与西域混为一谈<sup>③</sup>。王夫之对之抨击更为激烈：“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为地形之果如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则地之欹斜不齐，高下广衍，无一定之形，审矣。而利玛窦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丸，何其陋也！”<sup>④</sup>清初著名的理学家陆世仪也表示难以理解西方地圆说：“地在中，四围俱有生齿，海水周流于地……此说不但我辈难信，即传其学如李之藻者亦疑之。”因为“若海水附地周流而行，尤非水无有不下之理？”<sup>⑤</sup>有的清代学者甚至还认为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把中国所处之地译为“亚细亚”，西洋译为“欧逻巴”是居心险恶，因为“欧逻巴”“必夸大之语”；而“亚”者，《尔雅·释诂》云：次也；《说文解字》云：丑也；《增韵》云：少也。“细”者，《说文解字》云：微也；《玉篇》云：少也；可见“亚细亚”的中文则为“次小次洲也”。认为“明人甘受利玛窦之侮慢而不之觉，曾无一人悟其奸者”<sup>⑥</sup>。从这些一味固守旧说的思想家到完全抹杀客观事实所作出的简单结论乃至接连不断的辱骂者，我们可以看出，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士人没有能在地理学的学术层面上对利玛窦等输入的西方地理学进行真正的学术回应。其根本原因是明末清初的大部分学者对欧洲的存在始终将信将疑，因为对新的西方地理学的认可，有可能导致从物质技术到社会规范的一系列的认同，进而会对中国传统的心理认知系统产生挑战。

康熙禁教以后，“世界”在中国士人的心目中又开始变得一片混沌。康熙二十二年（1683）完成的《八纮译史》的作者陆次云，显然还接触过利玛窦

① 杨光先《不得已》卷下“孽镜”，参见陈占山校注《不得已附二种》，黄山书社，2000年，页53—63。  
② 宋应星《谈天·日说》，《宋应星佚著四种：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101。  
③ 王肯堂《郁冈斋笔麈》第三册，1602年刻本，页13、18、31。  
④ 王夫之《思问录内外篇》，同治四年（1865）湘乡曾氏刊本，页35—36。  
⑤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后集》卷之三“天道类”，光绪丁丑（1877年）江苏书局版。  
⑥ 平步青《霞外攬屑》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163。





的世界地图,但该书以中国为中心叙述的周边东南西北的基本结构是中外混杂,地理方位错误百出,表明基本上没有利用利玛窦世界地图的资料。而以后的一些地理学家竟然完全忽视利玛窦世界地图,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图理琛完成的《异域录》完全没有采用利玛窦的西方诸国的译名<sup>①</sup>。1730年著名的地理学家陈伦炯写成的《海国闻见录》仍是用《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和《昆仑》等篇章来记述外国地理,这种“五洋”仍不脱天朝为中心的阴影。他所绘的世界地图甚至没有南北亚墨利加洲。

由这些政治权力意识的渗透和非学术见解的回应,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曾经组织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地图测绘的中国,却在后来官方绘制的《西域图志》中仍不绘经纬线,民间个人绘制的《西藏图考》、《西招图略》、《卫藏图识》不仅未绘经纬线,甚至连比例尺也不受重视了<sup>②</sup>。清代中期以后的百余年间,中国学者几乎已经无法理解地圆说以及中国之外还有着辽阔的五大洲。直到光绪年间还是有不少怀疑者,如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写道:“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日不动而地动。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主初亦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乃信。”<sup>③</sup>以后王之春还把“大地之土……泰西人分为四土……中华仅得亚细亚四分之一”作为自己的重大发现写入《椒生随笔》一书<sup>④</sup>。知识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进步的想法只是人们的一相情愿,如果一个社会的知识成果不能有效地得到积累,那么,社会总体知识水准往往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晚明至晚清的地理学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 四、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晚清西学知识重建过程中的意义

18世纪以后,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清代民间极其罕见难觅,除了几个翰林学士外,绝大多数人无缘目睹,因此很少被提及,其基本过程是从影响广泛渐渐走向湮没无闻。到了康熙末年,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影响已基本消失。有学者解释其原因主要有五:(一)刻版繁杂、制作不易;(二)挂图面积过

① 陈观胜《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禹贡半月刊》第5卷(1936年)第3、4合期。  
②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页330;清代学者陈澧《邹特夫地图序》也谈到康熙以后的中国地图渐失经纬线的问题,参见《东塾集》卷三,页16—17。  
③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岳麓书社,1985年,页312。  
④ 王之春《椒生随笔》,岳麓书社,1983年,页114。



大,不便转运和储藏;(三)易代动荡、难以保全;(四)缺乏理解、无人关注;(五)内容过时,渐成古物<sup>①</sup>。这些解说虽然都有道理,但最重要的是清中叶之前的学界没有形成对西方地理学新知识的强烈需求,以利玛窦世界地图为代表的来自西方的地理学知识资源,没有成为士大夫面对现世问题所必需的知识储备。

19世纪初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就非常关注利玛窦世界地图,他所编纂的《英华字典》中收录“天球”、“地球”、“半球”、“南极”、“北极”、“赤道”、“地平线”等来自该地图的译名。19世纪中期,中国直面西方的坚船利炮后,利玛窦世界地图再度为中国学界所关注,晚清地理学家重新认识到利玛窦在汉语世界传送世界地图的价值。晚清第一部引进西方人世界观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百卷本《海国图志后叙》开篇第一句就是:“谭西洋舆地者,始于明万历中泰西人利马窦之《坤舆图说》。”<sup>②</sup>这个《坤舆图说》是指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文字部分。《海国图志》卷三十七“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中特别写出“案语”,称“明万历二十九年,意大利亚人利玛窦始入中国,博辩多智,精天文,中国重之。自称大西洋之意大利人,未尝以大西洋名其国”<sup>③</sup>。卷七十四“国地总论”上“释五大洲”有“考万历中利马窦所绘《万国地图》”;卷七十五《国地总论》中专门有一节全文收录了《坤舆万国全图》上所写的序言,题为《利玛窦地图说》,几乎全文著录了利玛窦世界地图中关于地圆说、赤道、南极、五带划分以及五大洲的基本概念<sup>④</sup>。可见魏源是仔细研读过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利玛窦在其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创造的词汇,如“天球”、“半球”、“赤道”、“南极”、“北极”、“北极圈”、“南极圈”、“地平线”、“经线”、“纬线”、“大西洋”、“地中海”、“红海”、“海岛”、“亚细亚”、“欧罗巴”、“亚墨利加”等术语,都频繁地出现在晚清各种地理学文献中。特别是“地球”、“泰西”、“欧洲”(包括“欧罗巴”)、亚洲(包括“亚细亚”)、美洲(包括“亚墨利加”),都成为高频率的关键词。有些字词因为利玛窦的使用而改变了原来的通行使用法,成为地名学上一种特殊的用法,如“洋”的古义是广大,后多用于南方许多小地名中,表示山间平地或田间,明

① 黄时鉴、龚纓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112。

②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页7。

③ 同上书,页1093。

④ 同上书,页1847、1865—1867。

晚明汉文西学经典·  
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



074

代以前以“洋”字为地名的很多<sup>①</sup>，自从利玛窦首次在世界地图中用于“大西洋”后，经《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和《地球图说》等广泛流行，成为一个主要用于海域的地名用字。

李纪祥在《海上来的世界图景》一文中高度肯定了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晚明和魏源《海国图志》的历史地位，同时指出：“从魏源自身的‘历史第一’到他与利玛窦的‘历史第一’所连线出的历史主轴中，近代史的学者们常常也站立在魏源所筑的平台上，展开以利玛窦为第一名的世界地图与新世界观的历史主轴之细节填补的努力，俾便勾勒出一幅更为详细的世界观演进史（或是欧洲人输入新世界观的接受史）之历史版本。”<sup>②</sup>魏源的历史平台在影响后人的视野上是深刻的。梁廷枏在接触新教传教士传入的新西学文献的过程中，继续回应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如在《合省国说》一书中讨论“米利坚国人以有以汉文自志其本国事者曰《合省国志略》”一书时指出，利玛窦当年呈献的《万国图》“始以天下分五大洲”，“其后，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并同其说”。而《合省国志略》一书“其言与利玛窦大同小异”<sup>③</sup>。王韬在看到《地球图》时也提及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大地如球之说，始自有明，由利玛窦入中国，其说始创，顾为畴人家言者，未尝悉信之也。而其图遂流传世间，览者乃知中国九州之外，尚有九州，泰西诸国之名，稍稍有知之者，是则始事之功为不可没也。”<sup>④</sup>天主教会系统出版的《五洲图考》更是直接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作为自己利用的知识资源，如李杕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直接将晚明驻足中华、以“传授西学为己任”的利玛窦、艾儒略、高一志等人的著述作为研究的前导，称赞这些西方地理学著述“付梓行世，当时名公卿争先快睹，脍炙一时，是中国有全球图考，自西教士始也”<sup>⑤</sup>。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也大量利用利玛窦世界地图及其汉译名，如“大西洋”、“地中海”、“红海”、“海岛”等。他一方面高度评价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重建西学知识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文献所存在的缺陷，表现出要在利用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地理学汉文西书的基础上重建世界地理体系的雄心。在该书《凡例》中他指出：“泰西人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之属。皆久居京师，通

① 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60—161。

② 李纪祥《海上来的世界图景——从利玛窦到魏源的世界新图与新世界观》，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页364—365。

③ 梁廷枏《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页53。

④ 《地球图》跋，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页231—232。

⑤ 龚柴、许彬《五洲图考》，徐家汇印书馆，1902年。



习汉文，故其所著之书文理颇为明顺，然夸诞诡譎之说亦已不少。”<sup>①</sup>

晚清西学知识重建中非常重要是关于第五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认识。魏源的《海国图志》修正了长期以来第五大洲发现和变化的历史。百卷本《海国图志》依据玛吉士的《地球总论》，列出了“欧罗巴”、“亚细亚”、“亚非里加”、“美里加”和“阿塞尼亚”。对利玛窦世界地图中“墨瓦蜡泥加”的“未审”状态有了进一步的认知，澳大利亚以及周边群岛的陆续发现并获得的进一步的探测，使模糊的南方大陆逐渐换成以澳大利亚为主的南太平洋诸岛合成的“大洋州”。梁廷柟《海国四说》也声明利玛窦所述“墨瓦蜡泥加名”并不存在，所谓“第五洲为澳大利亚”，“此与利玛窦之称墨瓦蜡泥加洲不符”，考虑到“利玛窦之说传述已久，故仍之”，“澳大利亚洲（即西人所称天下第五洲者），即墨瓦蜡泥加洲，自古不通人迹之处，兽蹄鸟爪，地野人稀，无君长、城廓、宫室、伦理者，亦听民驾舶徙家于洲之东、南、西三方。凡愿迁者，官资其费，而经其界焉”<sup>②</sup>。此或许为中国人最早使用“澳大利亚”一名，并且是关于澳大利亚地理和移民情况的最早记述。徐继畲《瀛环志略》则有更为详细的讨论，称“澳大利亚，即泰西人《职方外纪》所云天下第五大州”：

澳大利亚，一名新荷兰，在亚细亚东南洋巴布亚岛之南，周回约万余里。由此岛泛大洋海东行，即抵南北亚墨利加之西界。其地亘古穷荒，未通别土。前明时，西班牙王遣使臣墨瓦兰，由亚墨利加之南，西驶再寻新地。舟行数月忽见大地，以为别一乾坤。地荒秽无人迹，入夜磷火乱飞，命名曰“火地”，又以使臣之名名之曰“墨瓦蜡泥加”。西班牙人以此侈航海之能，亦未尝经营其地也。后荷兰人东来建置，南洋诸岛展转略地，遂抵此土，于海滨建设埔头，名之曰“澳大利亚”，又称“新荷兰”。旋为佛郎西所夺，佛人寻弃去，最后英吉利得之。因其土地之广，坚意垦辟，先流徙罪人于此，为屯田计，本国无业贫民愿往谋食者，亦载以来，他国之民愿受一廛者听之。地在赤道以南，天气炎燥，海滨多平土，山岭高者不过三十丈，江河绝少，杂树荒草，灌莽无垠，鸟兽形状诡譎，与别土异。土番黑面，披发裸体，食草根山果，结巢于树，予之酒，一饮即醉，卧泥中，如豕负涂。男役女若畜，怒辄杀之。英人流寓者，垦海滨湿土，种麦与粟。草肥茂，牧羊孳乳甚速，毛毳细软，可织呢绒。现居

① 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2001年，页8。

② 梁廷柟《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页54、155。



民不足十万，每年运出之羊毛值银二百余万两。百物未备，日用之需皆从别土运往。英人于东境海口建会城曰悉尼，居民二万。捕鲸之船时时收泊，贸易颇盛。而流徙之户莠民饮博荡侈，相习成风，流寓良民，亦颇染其俗。而境滨大南海，英人新徙人户已成聚落，西境亦创置一廛，在江河之滨，北境近赤道，天气酷热，产海参、海菜、燕窝，英人派陆兵驻守，以防侵夺。计澳大利亚一土，英人四境所耕收仅海滨片土，不过百之一二，其腹地则奥草丛林，深昧不测，土番如兽，老死无往来，不特风土无从探访，即山川形势亦无由乘轺历览。英人谓此土虽荒旷，而百余年后当成大国，南海诸番岛当听役属如附属也，近命名曰南亚细亚。<sup>①</sup>

关于澳大利亚的认识表征着国人对于“五洲”认识的确切性，对澳大利亚的清晰描述表明了晚清最终摆脱了明末以来关于“墨瓦蜡泥加”的想象，使“世界”在国人眼中呈现出一个真正完整的面相。

不难看出，对于晚清以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知识阶层来说，虽然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不少地理知识已被西方新的地理学知识所取代，但一些基本概念，如五大洲的观念、经纬度的概念、气候带的划分方法、地理大发现的新成果，甚至一些世界各地风俗民情的介绍，特别是汉译外国地理名词，如亚细亚、欧逻巴、北极、南极、地中海等，都在晚清西学知识场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了犹如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一样的重要价值。而对待世界地图的态度，似乎也是进步与保守的一个重要的分野，如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创办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其中一幅世界地图，是在北京费了一两月之久仍无法寻觅到，而最后辗转托人从上海购来的。“图至之后，会中人视同拱璧，日出求人来观。偶得人来观，即欣喜无量。”结果强学会被查禁时，此世界地图亦被步军统领衙门抄去查扣<sup>②</sup>。正是晚清进步学人有效地利用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等一批耶稣会士有关西方地理学的重要知识资源，并进一步输入西方新的地理学知识，重新反省传统的经典，回应新的西学文献，才使近代中国的知识世界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巨大变化。

<sup>①</sup> 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2001年，页57、60。

<sup>②</sup>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2—43。



## 五、本章结语

利玛窦是入华传教士中第一位将欧洲世界地图和世界观念传送给国人的传教士。1584年至1603年的二十年间,他多次编绘中文版世界地图,形成了《山海輿地图》、《坤輿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三个重要的传播系列。通过对这三个系列的世界地图的考察,我们可以知道,利玛窦不仅把欧洲传统的地理研究的成果和地理大发现以来最新的成就介绍给了中国人;而且收集和利用了文献的资料,特别是自己旅行实测的资料,据此绘制了比同时代欧洲制图学家所绘更为精确的有关中国的地图。尽管今天看来,现存的《坤輿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还存在着很多的错误,但地圆观念及其地球知识带来了全新的宇宙解释的模型,五大洲的自然地理和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的介绍,大大拓展了中国知识阶层的眼界,打破了明清士人以中国即为“天下”的夜郎自大的观念。中国传统地理学有着丰富的地理沿革的考订和关于社会历史的记述,但由于传统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地域性,决定了中国地理学不仅缺少自然地理的专业术语,而且在域外洲名、国名、地名的翻译上,同样存在着所能利用的词汇库的巨大空白<sup>①</sup>。利玛窦世界地图为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提供了第一批具有相当质量的自然地理和世界人文地理的专业术语和地区译名,大大丰富了中国地理学的词汇库。利玛窦在绘制世界地图时所采用的西方实地测量的方法和精确的地图绘制技术,不仅为中国学者的地图绘制提供了科学的示范,更重要的是给中国学者带来了实验科学的精神。

利玛窦创制了最早的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当然希望地图能服务于教会传教的利益。正像裴化行所指出的:“利玛窦相信,在入手的时期内,为令中国人易于走入信徒真理的路径,最能有帮助的,是带有中国字的世界地图。”<sup>②</sup>但作为一个高明的学者,他没有让传教的利益像沸水一样喧腾于世界地图的画面,没有让地图庸俗地为传教服务。他把利益隐藏起来,把自己消失在呈现的真实世界的背后。他在地图中有自己的编码,如将“六万里”改为“八万里”,将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中心的位置,但这种选择不完全是蓄意违背科学的伪造,而是为了将西方地图的信息成功地输入中国这个古老的

① 参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234—265。

② [法]裴化行著,萧清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277。



世界。美国学者丹尼斯·伍德指出：“地图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影像；除非就最狭隘的欧几里得几何学而论，否则地图既非真亦非假。就内容的选取以及再现的符号与风格而论，地图都是一种想象、连结，以及构造人类世界的方式。”<sup>①</sup>

我们不能否认，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内部表意功能是为了服务于他传教的目标，即打破中国人传统的夜郎自大的天朝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但是，利玛窦的工作在明清间文化人有限的圈子中是初见成效的，明末清初的文化界确实有相当一批士人已经接受利玛窦所传播的地球观念，改变了心目中的世界图像，开始瓦解传统的“天下”和“四夷”的观念，建立起初步的中国为“万国”中之一国的“世界意识”。我们确实在明清士人社会中看到了利玛窦世界地图所产生的巨大的文化力量，它包含着积聚的欧洲文化的资讯，其力量在于可以进行成千上万的复制与广泛的散布，它胜过传教团体和传教士个人的谆谆教诲，把一些西方的智慧、创造和发现简化为常识，成为中国士人头脑中的事实。地图中的世界虽然不是中国士人可以嗅到和亲眼目睹的“真实世界”，但是却在努力向中国士人呈现一个能见的世界图式，一个所能了解的世界缩影。

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明清社会的传播史告诉我们，一种新观念的传播与当时的社会土壤和文化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明清间的中国社会尚未形成西方地理学得以根植的土壤，特别是清初满族人主中原，汉族士人的华夷观念伴随着抗清运动并不是削弱而是进一步得到有意识的强化，顾炎武《徙戎》一文就典型地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严夷夏之大防意识，认为夷狄一旦学习了中国的统治方法，熟习中国的礼仪风俗后，“而狼子野心，旋生于异日。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由于此”；主张采用古代圣贤的驭夷之法，不能“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要把夷狄与中国文化隔离开来<sup>②</sup>。原来还尚未在明末士人社会中完全确立的“世界意识”，被异族入侵后兴起的强烈民族意识彻底挤压掉了。像顾炎武这样有学问的人竟然在世界地理方面表现得非常无知，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銃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先年潜遣火者亚三假充满刺加国遣礼使臣，风飘到澳，往

① [美] 丹尼斯·伍德著，王志弘等译《地图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页123、172。

②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6年，页1039—1042。



来窥伺，熟我道途，略买小儿，烹而食之。”<sup>①</sup>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清初未能有效地用于研究西方这一陌生的世界，“世界”在康熙时代以后的士人心中仍变得一片混沌。没有一批学者有效地去发掘和利用这一新的知识资源。康熙五十四年(1715)图理琛完成的《异域录》完全没有采用利玛窦等人的西方地理译名，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中的“五洋”仍不脱天朝为中心的阴影。上述这些中国人的外国地理著述，无论在资料上还是方法上，都是在利玛窦世界地图基础上的大倒退<sup>②</sup>。乾隆八年(1743)成书的《大清一统志》，根本无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所编的世界地图，一会儿说西洋在印度洋附近，一会儿又说西洋在西南海中，又说苏门答刺、爪哇、佛郎机、荷兰，也在西南海中。

关于天地自然、地域大小、方位的中心与边缘，构成了一个时代空间格局的认识，即所谓“地理台阶”<sup>③</sup>。自汉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都是在“天下”观念支配的“地理台阶”上建构起来的，不能深刻认识和理解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意义与价值，因而后来也没有人能对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地理学知识作进一步的和深一层的学术研究，因此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对西方地理学的学术回应，这部分异质知识点无法有序地连成知识线，更谈不上建立全球认识上的“地理台阶”。而“地理台阶”恰恰正是知识结构产生变动的重要的基础。不能建立起世界意识的“地理台阶”，对域外文化的认识就无法踏上物质技术的层面，进而深入社会规范和心理认知的层面。即使已经传入的新知识点，也会由于缺乏可以凭借的“地理台阶”的依托，很快被淹没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里。利玛窦世界地图作为一种知识图式，给明清士人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范式”，但传统“天下”范式的支持者并不信服新的“世界”范式，新范式的支持者和传统范式的捍卫者对于自己理论的解释和经验的发现长期争论不休，新的地理知识无法得到有效的积累，新地图的知识系统所提供的“世界意识”，无法成为地理学研究领域中知识成长的模型，进入到明清间知识阶层的心理层面或实用层面，而产生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晚清在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33册，“交趾西南夷”，“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页47—48。

② 参见陈观胜《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禹贡半月刊》第5卷(1936年)第3、4合期。

③ “台阶”原是指矿场不同的水平分层，操作者在独立的不同的分层上进行采掘。笔者这里借用这一术语来表示同一时代人们对地理的认识水准构成一种地理知识的认识台阶，同一时代的哲学的观念、政策的制订以及对域外文化的认识，往往都需要一种“地理台阶”作为依托。





列强环伺的变局下，士大夫开始逐渐认识到天朝中心主义的虚妄，又重提利玛窦世界地图、重新掀起西方地理学传播高潮的原因。

“世界意识”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的“世界意识”，其实只是“欧洲意识”；同样，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就是“天下观念”。人类文明交往史的转折开始于地理大发现。随着交流的范围空前扩大，间接、间歇的交流转变为直接与频繁的交流。西方传统的地区性海上贸易，也由此演变为面向世界市场的全球贸易，贯通西欧与美洲及西亚的大西洋航线、贯通美洲与亚洲的太平洋航线、绕道非洲南端好望角的印度洋航线，将世界各大洲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世界意义的“万国”经济与文化的交换体系。正如樊树志所言，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过程，不仅表现在经济的全球化，而且表现在文化的全球化。晚明是中国在经济上融入世界，同时也是文化上融入世界的开始<sup>①</sup>。长期以来的地区隔离的状况、文明舞台限于亚欧大陆的格局也归于终结。地理大发现使整个世界局部的文明交流转变为全面的交流，交流的层面也从物质技术走向更深层的领域。可以说，利玛窦所传送的“世界意识”是地理大发现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具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双重含义：地球被证明是一个球形，因此世界就“无处非中”，在地理上不存在什么中心和边缘；世界是由五大洲多元的实体所构成，因此，它的发展是多元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标准。这种理性的“世界意识”最早是在欧洲一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接触过东方文化的传教士群体中形成的。利玛窦在文化交流中所主张的“文化适应”，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输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中国传统的“利玛窦规矩”。也为初步建立起“世界意识”的徐光启、李之藻，甚至康熙皇帝所信奉。

对于时空观念的认识，是人类思维活动最深层的依据。“世界意识”的建立是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的一切工作的起点，是一项极为艰难的思想启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就是一个使自己从作为“天下”的中央之国转变为“万国”之一国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一直无法接受与域外民族进行平等交往的意识，将外使的来华视为“朝贡”活动，“抚夷”、“剿夷”和“师夷”、“制夷”的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交观念和对外意识。近代世界的形成决定了每个有活力和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民族，都应该具备“世界意识”，只有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整个

<sup>①</sup> 参见樊树志《晚明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46。

世界中的位置、角色和生存方式,一个民族才算有了真正的现代性体验。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使一个国际体系能够超越不发育的状态,它是国际社会得以生成和共存的原则。正是以此为基础,每个国家才会自认被一套共同的规范所约束,并且努力使这些规范在国际体系中得以正常的运行,对世界的充分理解才会使一个民族能够找到自己合适角度的立足点,能够从全球的方位去认识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从全球的背景来考察和看待自己民族的地位。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能平等地参与世界的共同体,既不过分倨傲,也不妄自菲薄,能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圆满的交流,从域外吸取和借鉴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事物,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开放和宽容的观念,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

